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小學生新視野百科知識叢書

政治新視野百科知識



政治

李大钊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十二个“第一”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大智若愚能解惑，微言如闪首传真。”这是林伯渠同志为李大钊题诗中的四句话。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下面辑录的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十二个“第一”，就是他“首传真”的伟大功业的部分实迹。

1. 1918年7月1日，李大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它论述了十月革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指出其伟大历史意义，启示中国人民“翘首以迎其世界新文明之曙光……而求所以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这是中国人歌颂十月革命的第一篇论文。

2. 1918年11月，李大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演说，第一个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向中国人民剖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3. 1918年11月，李大钊写了《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第一次向中国人民全面介绍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4. 1919年1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三期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劳动群众相结合的思想。

5. 1919年2月，李大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第一次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中国使用“帝国主义”这一概念，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

6. 1919年上半年，李大钊已信仰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因而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7. 1919年8月，李大钊写了《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判了胡适反马克思主义的谬论，他是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第一次论战中，第一个与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展开论战的英勇战士。

8. 1919年9月，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详细的阐述，这是中国第一篇比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

9. 1920年，由李大钊建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了“亢慕义斋”（即“共产主义”斋，来自英语）图书室，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收藏马列书籍的图书室。

10. 1920年，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史学系、经济系、政治系和法学系开设并主讲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课，这是在中国大学里第一次开设这样的课程。

11. 1922年11月，在李大钊的发起和推动下，北京《晨报》出版了纪念十月革命的专号，这是中国报纸出版的第一个纪念十月革命的专刊。

12. 1923年2月，李大钊发表了《一八七一巴黎的“康妙恩”》，这是中国第一篇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宣传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文章。

陈独秀、李大钊为何未参加“一大”

1920年8月，陈独秀率先成立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10月间，李大钊成立北京的共产党小组。他俩都是党的创始人，是党的“一大”发起者。然而他们为什么没有出席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呢？

据《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提供的资料，1918年2月李大钊经章士钊推

荐出任蔡元培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29岁的经济学教授李大钊很快成为进步教师和学生的一面旗帜。1921年3月中旬，国立北京大学等8所学校，为要求拨发教育经费等引起教育风潮，整整迁延达4个月之久。李大钊作为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代理主席（主席马叙伦有病）、半月刊总编辑，组织罢工向政府请愿交涉。频繁的事务，确使李大钊无法离开北京。更何况党的“一大”是秘密召开的，而李大钊当时已是社会名流，他的行动会引起社会注意，受北洋军阀威胁。于是，便由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支部参加会议。

至于陈独秀，其时正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提出辞呈尚未获准；同时，他还在筹集广东大学预科班经费，也抽不出身，便派正从湖北赶来向他汇报工作的包惠僧出席了党的“一大”。陈独秀还向大会写了《致出席代表信》，内容有四点：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指导，三曰纪纲，四曰慎重进行征服政权问题，概括为思想、民主、纪律、夺权。可见，陈独秀对党的“一大”召开是非常重视的。尽管陈独秀未能出席“一大”，可是代表们还是把他选为中央局书记。

毛泽东为什么没有出席党的“双数”大会

中国革命史上有一个有趣的情况：毛泽东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七次代表大会中的单数大会——一大、三大、五大、七大，却没有出席双数大会——二大、四大、六大。这是客观因素造成的一种巧合。

党的二大是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会址在今上海市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毛泽东当时已经到了上海，由于行程匆忙，地址没记住，结果没能参加上会议。

毛泽东没能出席党的四大，其主要原因是当时他病了，在湖南家乡休养。

党的六大是1928年6月7日在前苏联莫斯科召开的，当时毛泽东正在井冈山建立革命根据地，不能远行。

“一大”所代表的党员人数究竟是多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问题的决议》在回顾党的创立时写道：“中国共产党成立时只有五十多个党员。”许多党史资料上也是如此记述。说明党的“一大”所代表党员的具体数字，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定论。

建国后，党史界就党的“一大”所代表多少党员，曾有过如下几个具体数字表述。一个是50年代编写的中共党史教科书说，“一大”的12名代表代表着全国57名党员（见195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王实等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编》）。同年新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新知识词典》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一词条下也是这样叙述的（见该词典第230页）。一个是1980年《中国百科年鉴》上写的：“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着全国七十名党员。”再一个是张国焘认为一大所代表的党员是59名（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我认为，这些数字都是不确切的。

接近年新发现的材料，“一大”代表全国党员的真实人数应该是53名。因为1956年苏共中央移交给我们的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档案中有一份俄文稿件写到：“这个组织逐渐扩大了自己的活动范围，现在共有六个小组，有

五十三个党员。”（转引自《党史研究》1980年第一期第51页）这个文稿虽不是中文原样，但它曾得到“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的认可，在未发现其它中文文字记载以前，我们可以认为是比较可靠的材料。而肖克同志在肯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时说：“对于‘一大’开会日期的考证清楚了”。那么，“一大”时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同样是应该肯定的。理由在于开会日期的考证依据亦出自上述文稿。既然该文稿可以作为党的一大开会日期的依据，那么也应该据此把所代表的53名党员人数予以肯定下来。

中共一大代表的归宿

中共一大代表，由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出的共有12人，另有一名陈独秀派来的代表包惠僧。以后在激烈的革命浪涛中，他们大致有三种不同的归宿。

一、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7人

1. 毛泽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为我们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1976年9月9日病逝于北京。

2. 董必武。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对我国人民民主政权和社会主义法制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75年4月病逝于北京。

3. 李达。中国现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一大”以后，曾因不满于陈独秀、张国焘的作风和不愿加入国民党等，于1924年9月退出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12月由刘少奇介绍，毛泽东、李维汉等作历史证明人，重新入党。任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校长，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几十年来，他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1966年8月在武汉逝世。

4. 陈潭秋。1939年5月，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2年9月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在狱中进行了顽强斗争，1943年9月被秘密杀害于迪化（今乌鲁木齐）。由于当时党中央不知道陈潭秋已牺牲，1945年党的“七大”上仍当选为中央委员。

5. 何叔衡。在中央苏区曾担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检察人民委员、最高法院院长等职，为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央红军长征时，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1935年2月，在福建长汀、武平交界地区，被敌人包围袭击，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斗争，壮烈牺牲。

6. 邓恩铭。“一大”后回到山东，积极开展建党和工人运动。历任中共青岛支部书记、市委书记，山东区委、省委书记等职。1928年12月，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于1931年4月5日在济南英勇就义。

7. 王尽美。“一大”后回到山东，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先后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山东分部主任、中共山东地委书记等职，积极从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作。1925年8月，因积劳成疾，无法医治，在青岛医院逝世。

二、脱党后为人民做过有益工作的3人

1. 李汉俊。“一大”后不久，由于对陈独秀、张国焘不满，并在一系列

问题上同党发生了严重分歧，自动退党，党的“四大”将其开除出党。脱党后，能积极投入国民革命，为湖北的国民教育做出了贡献。大革命失败后，于1927年12月17日在武汉被桂系军阀杀害。建国后，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2. 包惠僧。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南下时，因病留在南昌，此后脱离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国民党军队和政府部门任职，1948年去澳门。1949年11月回到北京，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任内务部研究室研究员，内务部参事。1957年以后任国务院参事。1979年7月病逝于北京。中央开追悼会，称为同志。

3. 刘仁静。“一大”后仍回北京大学学习，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与宣传。1926年被党派去莫斯科学习，1929年8月回国。在归国途中，专程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太子岛上拜访了托洛茨基。回国后即进行托派组织活动，被开除党籍。全国解放后更名刘亦宇，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后在人民出版社工作。1987年8月6日因车祸在京逝世。

另：脱党叛变成为革命敌人的3人

1. 陈公博。“一大”后回到广州，因反对党联合孙中山的政策，宣布“独立行动”，1923年被开除党籍。大革命时期，在国民党内担任农工部部长等要职。抗日战争时期，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汉奸政府任立法院长，1944年汪精卫死后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第二号大汉奸。1946年6月在苏州监狱被处决。

2. 周佛海。“一大”后仍赴日本读书，毕业后回到广州，因参加国民党右派活动，于1924年冬被开除党籍。大革命中追随蒋介石，后在国民党中央担任中宣部代部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在南京汉奸政府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成为第三号大汉奸。抗战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判处无期徒刑，1948年因病死于南京监狱。

3. 张国焘。“一大”以后，历任中央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红军长征途中分裂党和红军，另立伪中央，拒不接受党的挽救，于1938年4月只身投靠蒋介石，在国民党特务机关担任反动职务。于1948年11月逃往台湾，1949年冬移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养老院。

主持党中央工作的历任领导人

陈独秀。1921年7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第一次大革命后期，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导致了革命的惨重失败。1927年“八七”会议上，被撤销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后来，坚持错误立场，并与彭述之等人组织反党小集团。1929年11月，被开除党籍。

瞿秋白。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汉口主持召开党的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撤销陈独秀职务，选举产生临时中央政治局，被选为常委。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犯有“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党中央在纠正其错误后，仍由瞿主持中央工作至“六大”。

向忠发。汉阳兵工厂工人出身。1922年入党，曾任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

员，是“八七”会议选出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1928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在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总书记。但他没有起到总书记的作用，实际为李立三代替。1931年6月在上海被捕叛变，旋即被国民党政府枪杀于上海龙华。

李立三。于1930年6月开始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宣传部长、中央秘书长，实际上负责党中央的领导工作。1930年6月至9月，他在全党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给革命造成严重损害。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他的错误，他自己也认识了错误，会后离开了领导岗位。

王明。（原名陈绍禹）1929年至1930年和其他一些教条主义者陆续从前苏联回到中国，打着“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路线”的旗号，进行以夺取中共中央领导权为目标的反党宗派活动，迫使中央于1931年1月召开六届四中全会。会上王明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后不久，又补为政治局常委。6月，向忠发被捕后，王明代理总书记，成立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同年9月，他去前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以后，仍通过博古继续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时间长达两年多，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

秦邦宪。（又名博古）1931年9月，王明（已去前苏联）同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指定博古为临时中央政治局书记和总负责人。他积极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政策。1934年1月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总书记。与李德推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致使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在遵义会议上被撤销中央总书记职务。

张闻天。（又名洛甫）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在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随后政治局常委分工，由他代替邦宪总负责，主持中央日常工作。1938年后，兼任中央宣传部长、延安马列学院院长等职。

毛泽东。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后又与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军事领导小组，从此确立了他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1943年3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在1945年党的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由此开始至1976年9月逝世，他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

华国锋。1976年10月7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决定华国锋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1977年7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追认。1977年8月中共十一届一中全会上，他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同意他辞去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胡耀邦。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决定设中央书记处，他为总书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通过新党章，只设总书记，不再设主席，他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其辞去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赵紫阳。1987年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央代理总书记。1987年11月，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9年6月，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撤销其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务。

江泽民。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这次全会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的领导集体。

党和国家部分领导人入党时的年龄

新中国诞生以来，担任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入党的。以下是他们入党的时间和年龄：

毛泽东 1921 年 28 岁；周恩来 1922 年 24 岁；刘少奇 1921 年 23 岁；朱德 1922 年 36 岁；邓小平 1924 年 20 岁；陈云 1925 年 20 岁；叶剑英 1927 年 30 岁；董必武 1921 年 35 岁；彭真 1923 年 21 岁；邓颖超 1925 年 21 岁；乌兰夫 1925 年 19 岁；胡耀邦 1933 年 18 岁；李先念 1927 年 18 岁；王震 1927 年 19 岁；万里 1936 年 20 岁。

我党历次党代会的秘书长

我党从 1921 年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 1925 年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四次大会都未设秘书长一职。

1927 年 4 月 27 日在武汉召开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起，以后的每次大会都设有秘书长一职，负责处理会务工作。他们是：五大秘书长蔡和森，六大秘书长周恩来，七大秘书长任弼时，八大秘书长邓小平，九大秘书长周恩来，十大秘书长张春桥，十一大秘书长汪东兴，十二大秘书长赵紫阳，十三大秘书长胡启立。

我国党员人数的三项统计

1. 我国党员人数已超过 4600 万，占世界共产党人数的一半以上。

2. 在我国总人口中，大约每 23 个公民中就有一位是共产党员；在成年人口中，每 15 人中就有一位是共产党员。我党召开“七大”的时候，党员人数是 121 万，当时每 372 个中国人中有一个党员，到了“八大”时，党员人数为 1070 万，与总人数之比为 1：60。

3. “文革”中，新发展党员 1700 万，整党中被开除、劝退的还抵不上党的队伍的自然减员。

哪些人被党中央直接接收为党员

从党的“二大”到“八大”，党章均规定党中央有权直接接收个别同志入党。“九大”、“十大”和“十一大”通过的党章中，没有了这条规定。1982 年党的“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中又作了这样的规定：“在特殊情况下，党的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员会有权直接接收党员。”

据有关资料记载，被党中央直接接收为党员的有杨度、叶挺、邹韬奋、续范亭、赵寿山、范据有关资料记载，被党中央直接接收为党员的有杨度、叶挺、邹韬奋、续范亭、赵寿山、范铭枢、郭沫若、李又然、赵博生、董振堂、许广平、沈雁冰等同志。“十二大”以后，党中央还直接批准接收了庄希泉（全国政协副主席、原全国侨联主席）、陶峙岳（原国民党高级将领、

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部队原副司令员)、董其武(原国民党高级将领、全国政协副主席)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

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也是由党中央直接接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的。

部分党史人物的化名与笔名

李大钊:李钊、守常、季昌、寿昌、龟年、耆年、严明、孤松、明明、志钊、猎猎、钊影冥冥、琴华、常、赤。

陈独秀:陈仲甫、仲子、陈乾生、张次南、只眼、陈仲、庆国、实庵、撒翁、实顽石、山民、陈仲子、由己、仲山、熙州仲子、独秀山民、甫仲、仲。

毛泽东:二十人画生、赵东、润之、润子、任石、李德胜、毛充滋山。

刘少奇:胡服、莫文华、陶尚行、刘光明、之启、虎服、吕文、仲篻、刘作黄、刘梭长、刘绍选、刘渭璜、刘绍基、开冈、刘绍箕、戴先生、周先生、华云、卫黄、肇启、尚陶、凯风、凯丰、刘祥、邵琪、老戴、能、实。

周恩来:飞飞、伍豪、少山、冠生、维思、胡必成、赵来、冠。

朱冠:玉阶、朱健德、王楷、达第诺夫、宋代珍。

陈潭秋:陈澄、文光、徐杰、云先、吴觉民。

王若飞:王运生、雷音、黄敬斋、穆泽夫、王度、继仁、涅。

任弼石:任培国、辟世才、史林、布林斯基、诗圆。

肖楚女:楚侣、丑女、匪石、抽玉、肖秋、楚、女、玉。

张闻天:洛甫、思美、洛夫、罗浮、平江、赵天。

王明:陈绍禹、韶玉、慕石、沼玉、兆雨、泰山、马马维奇、波波维奇、绍玉、绍予、玉、慕、石。

张国焘:张特立、凯音、桤荫、天师、国涛、特。

中国革命中的共产国际人物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国际无产阶级革命关系密切,从1920年3月起,共产国际就多次派代表到中国调查形势和帮助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共产国际与我党还有组织上的联系,我党也派出代表驻共产国际。

共产国际派来和我党派出的人员,都与当时不同阶段:党的成立、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土地革命、红军长征以及共产国际内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争论、决议等重大事件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历史条件,这些人物人们所知甚少。他们是:马林、王若飞、王明、加仑、加拉罕、任弼时、米夫、达林、李大钊、张太雷、李德、张国焘、罗易、罗明纳兹、维京斯基、越飞、蔡和森、鲍罗廷、瞿秋白等共19位。

党的六大后中央秘书长是周恩来还是李立三

1928年6月至7月召开的党的六大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等都被选为中央委员。1928年7月中旬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届一中全会上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选举结果是:中央政治

局正式委员 7 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1928 年冬撤销，补入李立三），政治局候补委员 7 人：李立三、彭湃、杨殷、罗登贤、关向应、徐锡根、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5 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项英、蔡和森（1928 年 11 月撤销，补入李立三），候补常委：李立三、徐锡根、杨殷。主席向忠发。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长是周恩来。中央宣传部长是蔡和森。1928 年 11 月，由于蔡和森的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被撤销，中央宣传部长亦被撤销，由新补为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的李立三接任。与此同时李立三还接任了中央秘书长一职。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1928 年 11 月，李立三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和中央秘书长，而不是党的六大后立即担任此职务的。

瞿秋白写在党史上的六个“第一”

1935 年 6 月 18 日，瞿秋白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 36 岁。瞿秋白一生太短暂了，然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却十分丰富和珍贵。下面记述的是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六个“第一”

1. 他是我国报道十月革命后苏俄实况的第一人。1920 年，21 岁的瞿秋白以北京《晨报》驻俄国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苏维埃俄国进行考察和学习，他在那里两年多，写成大量的通讯和散文，寄回国内发表，介绍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国初期的真实情况，内容遍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党的建设、工人组织、农民问题、民族问题等各个方面。

2. 他是我国现代用文艺体裁描写列宁丰采的第一人。瞿秋白曾几次见到列宁，第一次见到列宁是在 1921 年 6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三次大会上。他在《赤都心史》中写道：“列宁出席发言三四次，德法语非常流利，谈吐沉着果断，演说时绝没有大学教授的态度，而是一种诚挚果毅的政治家态度流露于自然之中。有一次在廊上相遇略谈几句，他指给我几篇东方问题材料，公事匆忙，略略道歉就散了。”这是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第一部描写列宁的历史画卷。

3. 他是我国完整译配《国际歌》词曲的第一人。1920 年 10 月，瞿秋白在莫斯科参加庆祝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的大会上，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并感到这支歌“声调雄壮”，决心把它介绍到中国来。1923 年 1 月 23 日，瞿秋白回到北京便着手翻译歌词。他既会弹钢琴，又会谱曲，很快就将歌词译成中文并配到歌谱里。同年 6 月，瞿秋白把《国际歌》的中文译稿发表在自己主编的《新青年》的显要位置上，并加了按语，介绍《国际歌》的来历和意义。从此，《国际歌》便在中国传唱开了。

4. 他创作了歌颂中国工农革命的第一首歌曲。1923 年，瞿秋白创作了《赤潮歌》，热情地歌颂了工农革命，他以笔名“秋渠”将该曲发表在当年 6 月的《新青年》季刊上。

5. 他创办了我党第一张日报。1925 年 6 月 4 日，瞿秋白在上海创办了《热血日报》。他是主办人，也是主要撰稿人。此报歌颂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揭露帝国主义军阀政府的罪行。

6. 他是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马列主义文学艺术理论的第一人。1931 年以后，瞿秋白翻译和介绍了俄罗斯和前苏联的许多文学作品，介绍了马、恩、列、斯及普列汉诺夫关于文艺的理论。

集数个“第一”于一身的女共产党员

我军著名文艺女战士危拱之于1905年出生于河南信阳，从小家境贫苦，青年时期即投身革命队伍。1926年，危拱之瞒过家人，毅然报考了武汉军政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开始了军人生活。因为她是缠足后又放大的，所以行动上困难更多。紧张的军校生活和各项严格的军事训练，使她付出了比别人多几倍的代价。她在军校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国第一批受过正规军训练的女共产党员之一。危拱之还是我军文艺工作的先驱之一。1931年，在江西苏区，她曾担任我军第一个比较健全的文艺机构——红军学校俱乐部主任。不久，又组织成立了红军和苏区的第一个剧团——“八一”剧团，危拱之是该剧团的负责人之一。她还是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参加者。红军到达陕北后，危拱之在延安担任“人民抗日剧社”社长，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协会”，后又参加组织红军剧团和培训各种文艺人材，为我军的文艺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党第一位女县委书记

李坚真，广东人，生于1907年，1926年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任福建省长汀县委书记，成为我党历史上第一位女县委书记。在革命战争年代，她担任过闽西特委、福建省委妇女部长和边区党委、苏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等职。1934年10月在江西瑞金参加长征，是著名的长征女战士。新中国成立后，历任粤中区党委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委书记、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

我党第一位女省委书记

万绍芬，生于1931年，江西人，解放前夕在江西一所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运动，解放初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先后担任共青团南昌市委副书记、共青团江西省委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和团中央候补委员，后又担任江西省妇联主任。她刻苦钻研法律，并通过考核获律师资格。1983年被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由于她德才兼备、富有开拓创新精神，于1985年6月被中共江西省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为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成为我党第一位女省委书记。

青年团的几个第一任书记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历史上最早的书记应该是俞秀松。1920年夏，陈独秀在上海发起中国共运史上的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上海共产主义小组。8月，共产主义小组内最年轻的成员被指派组建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年仅21岁的俞秀松就成了我国团史上的第一个书记。

1922年5月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施存统当选为团中央第一任书记，高君宇、蔡和森、俞秀松、张太雷与

施存统同为团中央第一届执委会会员。

在此之前的 1920 年 11 月，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高君宇被选为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书记。

长征中的外国人

在史无前例的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曾有两位外国人参加：一位是众所周知的共产国际派驻我党中央的军事顾问李德；另一位是鲜为人知的法国传教士。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奥地利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奥地利属于德国统治的奥匈帝国，他参加了德国军队同沙皇俄国作战，在一次战斗中被俄军俘获，流放到西伯利亚。十月革命后，他参加了前苏联红军，曾任骑兵师的参谋长，以后又被送到莫斯科陆军大学进修。毕业后被共产国际选派到中国来，担任中共中央的军事顾问，1933 年到达苏区。由于李德不熟悉中国国情，又不深入分析敌我双方力量对比情况，只凭军事课本上的条条进行指挥，加之当时正值王明左倾路线发展到极端，结果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1935 年 1 月召开的遵义会议上，左倾军事路线错误受到批判，李德亦被撤销了中央军事顾问职权，但仍继续随中央红军一起长征。因他是外国人，所以，在生活上仍得到特别照顾，组织上给他配备了两匹骡子；一匹给他乘骑，一匹专门给他驮东西。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在那里帮助训练过骑兵，还到红军大学讲过战役学。1936 年 10 月，斯诺到延安时曾访问过他。1939 年夏，我党送李德自延安经兰州返回前苏联。

参加长征的还有一位法国的传教士，名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1934 年 10 月 1 日，红六军团在突破黔军防地攻占贵州黄平时，指战员在一所教堂内找到一张约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省地图。这张地图对于刚进入贵州开展武装斗争的红六军团，简直是无价之宝。但因是法文，只好请既懂中国话也认识一些中国字的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来到红六军团司令部，帮助译成中文。他一边口译，一边与红六军团长肖克同志交谈，提供了不少情况，为确定部队今后的行动方向找到了一定的依据。开始时，这位传教士与红军还有隔阂，但随军到达湘西后，在逐步了解我党方针政策，耳闻目睹红军的一些真实情况后，思想有了变化，曾写信到上海、南京等地，多方设法为红军采购药品，筹集经费。其间，艰苦的生活曾使他试图离开红军，但因湘西周围敌情严重，情况复杂，他去而复返。1935 年 11 月，红二、六军团长征了，他又一起行动。在艰苦的转战途中，他有时骑马，有时步行，整整走了半年。到 1936 年 4 月，红二、六军团逼近昆明，红军首长考虑到军情紧急，战事频繁，于是让他离开部队，临行时还赠送了旅费。虽然阿尔弗雷德·勃沙特在红军中生活时间不长，但给他的印象很深，回国后曾写文章称赞中国红军英勇善战，纪律严明。这大概是外国人对中国红军的最早介绍。

“国际歌”最早的中文译词及译者

欧仁·鲍狄埃写的《国际歌》，在它发表后 50 周年的 1921 年 9 月，由郑振铎和耿济之译成中文发表在《小说月报》第 12 卷号外的《俄国文学研究》上，标题为《赤色的诗歌》，副标题为《第三国际党的颂歌》。署名是 L·Z，

L·T合译，其中前者是耿济之的笔名，后者是郑振铎的笔名。当时译成的歌词是：

起来罢，被咒骂跟着的，
全世界的恶人与奴隶；
我们被扰乱了的理性将要沸腾了！
预备着去打死战吧！

在译诗的附言中记述了1920年7、8月时，二位作者从友人处得到一本海參崴出版的俄共（布）的出版物《赤色的诗歌》歌集，其中第一首就是《国际歌》。

由于郑、耿合译的《国际歌》是从俄文转译的，加之时间仓促，尽管译文同今天的差距很大，但可贵的是二位译者能发现它的真正价值，并且最早译成中文，推荐给读者，其历史作用是值得称赞的。后来，《国际歌》又经瞿秋白等重译、修改、润色，才成为今天这个样子。

开国大典上的毛泽东

1949年10月1日下午1点半，警卫将一套专为毛主席参加开国大典缝制的黄色美军将校呢中山制服帮他穿好，而后请他去吃饭。毛泽东于2点来到勤政殿。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张澜、李济深、宋庆龄、高岗等国家领导人已在这里集合，他们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委员们宣布就职，并宣布中央人民政府即于本日成立。会后，大家都很兴奋，愉快交谈了10分钟左右。

2点50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由勤政殿门口出来，绕中南海东门，5分钟后到达天安门城楼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那时，天安门的地道尚未修，毛泽东顺城楼梯一步一步上了一百个台阶，登上天安门。3点钟，准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时的天安门广场是个十字形，东西从太庙到中山公园，南北从中华门到天安门的一个大十字，可容纳20万到30万人。从天安门城楼上远远望去，无数面翻卷的红旗形成一片波浪起伏的大海，红旗下面，一片片的穿了各种颜色服装的队伍，青、蓝、黄、灰、白，象是精心规划的花圃。现代人会觉得少一些色彩，那时在人们眼中却足够五彩缤纷了。天安门城楼下，白玉桥两边搭起两座台：一座是指挥台，一座是前苏联代表的观礼台。

毛泽东站定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深地望了一眼，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庄严激昂的声音，便如隆隆春雷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滚滚而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

刹那间，广场上欢声如雷，呼声如潮。毛泽东这时的表情是那么庄严神圣，两眼熠熠发光。按照预定程序，他亲自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毛泽东用他那扭转乾坤的巨手将电钮拨向“升”字，于是，人们英雄纪念碑奠基地点前高高矗立的旗杆上，那面巨大、鲜艳的红旗便在万众翘首仰望的庄严热烈的目光中徐徐升起。毛泽东的胸膛起伏不已，看到他亲手缔造的人民共和国如婴儿坠地一般终于诞生了，脱口喊了很大一声：“升得好！”

语音才落，礼炮惊天动地鸣响了，将那伟大、庄严、团结的气氛推向了高峰。

接着就是阅兵式。朱德总司令下达了阅兵令，这时候，红旗飘舞的广场屏息无声，只有军乐队奏着“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和着震撼大地的雄壮步伐声在天地间回荡。只是当我们的飞机飞临上空时，广场和城楼上才爆发了如雷如潮的掌声欢呼声。阅兵式进行3个小时，直到黄昏。

晚上，城楼下遍地燃起灯笼、火把，紫红、大红、桃红、金黄、橙黄、明黄……象人民无际无尽的欢乐和希望化身在天安门广场跳跃闪烁。歌声口号声海潮一般起伏不停。毛泽东不肯坐，从午后3点到晚上10点始终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始终举着一只手，时而庄严地停在空中，时而迅速有力地挥动几下。右手举累了，就换左手；左手累了，又换右手。当万岁声直冲霄汉时，毛泽东情不自禁地探身栏杆外，伸手招呼群众。终于，他面对麦克风高呼：“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

退场的群众发现领袖仍在他们中间，便改变了原来向东西分走的路线，潮水一般涌向天安门，挤在金水桥上，从肺腑里又发出呼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泽东在城楼上呼喊：“同志们万岁！”“人民万岁！”楼上楼下一呼一应，群众沸腾了！陈毅同志激动地放开嗓门：“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

周恩来筹备开国工作及组阁片断

平津战役刚结束，1949年1月31日夜，周恩来打电话给住在平山县李家庄的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长周子健等，要他们立即到西柏坡去。他们到达后已是半夜1点多钟了。周恩来对他们说：叶剑英同志已来了电报，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经签订。你们要连夜出发，赶到北平筹备新政协。同时接收三个地方：中南海、香山（作为党中央驻地）和北京饭店。

周恩来起草新中国施政纲领

6月中旬，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下设6个小组，分别承担拟定参加新政协会议的单位及其名额、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方案和起草新政协会议组织条例、共同纲领等项任务。会上，周恩来被推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组长。于是，周恩来亲自动手，其中有好几天，把自己关在中南海勤政殿，专心致志，起草共同纲领。

9月21日至30日，中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在毛泽东做了“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的开幕讲话后，会上，周恩来做了题为《关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经过和特点》的报告。这次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一建国施政纲领。并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定于北平改名为北京。同时，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

朱德推荐周恩来“管家”

早在1948年春，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曾向中央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刘少奇、朱德等汇报了应该赶快抓经济工作的问题，并提出了若干建议。但是怎么个搞法，还没来得及作深入的研究。朱德说：“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并且加重语气地说道：“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后来，周恩来便把精力集中到了筹组政务院及其所属机构以及领导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的工作上。于是，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

需要量很大的政务院机构的工作人员从哪里来？最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商议决定取消华北人民政府，把这个班底拿过来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基础，并参照华北人民政府的经验组织政务院。同时也从其他大区陆续抽出一部分人特别是负责人来充实、加强政务院，如陈云、李富春就是从东北调来的。

在人选问题上，政务院以及下属委、部、会、院、署、行的主要负责人，有许多是周恩来提名，同毛泽东慎重商议后，经政治局审定，再由中央人民政府正式任命。

周恩来十分重视民主人士的安排

对于民主人士的安排，是周恩来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鉴于民主党派在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斗争中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周恩来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都应有所安排。

首先是傅作义的安排问题。当时，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其中包括了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这样一批国民党著名将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的特殊贡献，他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首都北京，立下一个大功劳，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这样，周恩来提名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协助傅作义工作。在酝酿配备水利部领导班子时，周恩来请傅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等人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很快，傅向周总理推荐了原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比较负责的技术专家张含英和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的刘瑶章。不久，张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同时，周恩来委托薄一波每年请傅去作一次客。

周恩来还劝说黄炎培担任公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在旧中国曾多次拒绝旧政府的高官厚禄。1949年来到解放后的北平也无意做官。经过周恩来深入细致地做工作，黄炎培终于同意接受了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的职务。这时他已年过70。后来，他对子女讲了周总理向他动员的经过，并严肃地解释道：“以往坚拒做官是不愿入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

周恩来提议李书城当农业部部长。周恩来认为，他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之一，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起过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过去在我们党内有过贡献；在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他也做过有益的工作。这样做，照顾到了民主人士的各个方面。李书城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的。

周恩来深谋远虑，竭尽全力，在他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进来了。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比重。在4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员2人，民主党派人士2人；政务委员中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超过了半数；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93位负责人中，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许多民主人士对此十分感动。

新中国国务院（政务院）历届总理、 副总理、国务委员（政务委员）名录

政务院 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邓小平（1952年8月7日任职）；政务委员：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竑、李富春。

国务院 第一届 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

第二届 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陈毅、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薄一波、谭震林、陆定一、罗瑞卿、习仲勋。

第三届 总理：周恩来；副总理：林彪、陈云、邓小平、贺龙、陈毅、柯庆施、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聂荣臻、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陶铸、谢富治。

第四届 总理：周恩来、华国锋（1976年2月2日接任）；副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女）、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

第五届 总理：华国锋、赵紫阳（1980年9月10日接任）；副总理：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纪登奎、余秋里、陈锡联、耿飚、陈永贵、方毅、王震、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以下人员为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后陆续任命）王任重、陈云、薄一波、姚依林、姬鹏飞、赵紫阳、万里、杨静仁、张爱萍、黄华；国务委员：余秋里、耿飚、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薄一波、姬鹏飞、黄华、张劲夫、张爱萍。

第六届 总理：赵紫阳；副总理：万里、姚依林、李鹏、田纪云、乔石（1986年4月12日任命）；国务委员：方毅、谷牧、康世恩、陈慕华（女）、姬鹏飞、张劲夫、张爱萍、吴学谦、王丙乾、宋平、宋健（1986年4月12日任命）。

第七届 总理：李鹏；副总理：姚依林、田纪云、吴学谦；国务委员：李铁映、秦基伟、王丙乾、宋健、王芳、邹家华、李贵鲜、陈希同、陈俊生。

第八届 总理：李鹏；副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深、李岚清；国务委员：李铁映、迟浩田、宋健、李贵鲜、陈俊生、司马义·艾买提、彭珮云、罗干。

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有多少民主人士

中央人民政府组建中，有三位民主人士宋庆龄、李济深、张澜进入国家最高领导机构。

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或相当于部长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兼科学院院长、黄炎培任轻工业部部长、谭平山任监察委员会主任、沈钧儒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朱学范任邮电部长、章伯钧任交通部长、李书城任农业部长、梁希任林垦部长、傅作义任水利部长、史良任司法部长、何香凝任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胡愈之任出版总署署长。至于担任政法、财经、文教三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各部副部长的民主人士为数更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党外人士都是社会上经过几十年考验的中华民族的精英。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政务委员）是“七君子”成员，社会知名的民主战士；黄炎培、陈叔通在旧社会是不担任反动政府一

官半职的耿介之士；梁希先生是森林学家，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有名的教授，生活很清苦，但决不肯做蒋介石国民党的官，担任林垦部长是学有所用，甘挑重担。当时民主人士在中央人民政府中担任部长以上职务占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强，他们德高望重，深受人民信任。

人物·轶事

毛泽东

毛泽东（1893—1976年）字润之，湖南湘潭韶山冲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在半个多世纪里，毛泽东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创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又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最杰出的贡献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包括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总路线；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以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主要法宝。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包括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革命转变；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对农业、手工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探索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以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战略思想，等等。同时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些真有共产党人特色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于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原理之中，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刘少奇

刘少奇（1898—1969年）湖南宁乡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早年参与领导了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31年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6年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长期从事党在白区的领导工作，坚持执行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系统地批判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左倾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的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根据长期斗争实践，主张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党在白区的秘密工作必须实行深入群众、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以便在适当时机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战。中共七大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此前后，发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论党》等一系列著作，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党的建设的理论，对毛泽东思想作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论述。全国解放后先后担任政府副主席、主席，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积极参与党和国家重大决策的制定。“文革”中受到错误批判。1969年逝世。

周恩来

周恩来（1898—1976年）字翔宇，江苏淮安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曾先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八·一”南昌起义等革命运动。在国民党统治上海时期，为保证中共中央的安全，联系和指导各地区的武装斗争，发展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争取群众，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长征中及遵义会上，积极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西安事变中，通过谈判迫使蒋介石

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制止反共逆流，克服对日投降危险。此后，协助毛泽东组织和指挥人民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担任国家政府总理，积极参与制定党和国家的决策，处理党和国家的繁重的日常工作。曾代表中国政府多次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准则。为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及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著作编为《周恩来选集》。

邓小平

邓小平（1904—）原名邓先圣，学名邓希贤，四川广安县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曾先后领导了广西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领导太行山区军民坚持抗日斗争。淮海战役中任总前委书记，负责前敌指挥工作，后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起指挥渡江战役。全国解放后长期担任政府副总理，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决策。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包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关于把握时机发展自己、“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任务；关于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等一系列“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基本方针；关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发扬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致力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这些科学论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大理论指导意义。

孙中山

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号逸仙，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近代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早年参加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活动，以鲜明立场跟改良派作斗争。1905年成立同盟会，被推为总理，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政治纲领和三民主义，成为当时改造中国、振兴中华的思想武器。1911年推翻清政府，建立中华民国，结束封建帝制。十月革命后，孙中山随历史发展不断前进，转变思想，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改组国民党，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在极其曲折复杂的探索中，找到了挽救中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的乳名

毛泽东小时候有个乳名叫“石三伢子”，是外祖母替他取的。为什么取这么个乳名呢？

毛泽东的母亲文氏在生他之前曾生了两个男孩，但没有长大就夭折了。在生下毛泽东两个月以后，文氏把他带回湘乡外祖母家。外祖母特别看重这个外孙，硬要放在自己身边抚养。

湘乡这个地方有个风俗，为了把命根子带大成人，往往用家畜的名字来给孩子取小名，因为家畜长得贱，越贱就越容易养育。有的父母便给子女取乳名“牛仔子”、“羊妹子”等。毛泽东的外祖母不喜欢这类小名，却看中了本地山冲里一块大石头。这石头高达2丈，底下有股清泉流出，常年不断。传说很久以前这地方出过妖怪，经常光风作浪，有个人为民除害，把妖怪镇压在石头下。从此，当地的人们便把这块巨石当神朝拜。有一天，外祖母把毛泽东带到石头前烧香叩头，并拜石头为“干娘”。因为毛泽东排行第三，外祖母便给他取乳名叫“石三伢子”。

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前

1934年10月长征开始时，中国工农红军指挥机关分成两个司令部。军队系统被编在红星司令部；党的系统被编在红章司令部。毛泽东在红星司令部。由于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排挤。他这时在军队中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以前任红军总政委和苏区中央书记）。红军的实际领导人是博古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领导，长征才几个月，中央红军从8万人一下子减少了大约一半，不少同志已经开始觉察到王明路线的错误。

1934年底，红军到达遵义，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为了让更多的人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并支持自己的观点，他在会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第一个是做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是王明“二十八个半”中的一个，当时也执行过王明路线。长征时，王稼祥负伤睡在担架上；毛泽东身体不好，有时也睡在担架上。两个人就利用这个机会经常交谈，酝酿召开会议，总结军事上所犯的错误。

毛泽东第二个接近的是张闻天。张也一度追随王明路线。毛泽东主动与张接近，并同他住在一起，反复向他阐述自己的主张和见解，为后来在遵义会议上反对王明错误路线打下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还经常找周恩来谈心。毛泽东在长征路上向中央提的很多建议都是同周恩来谈的。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曾对妻子贺子珍说：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得不到他的支持，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此外，这段时间中，毛泽东还找军委和中委的朱德、刘伯承、彭德怀等人谈过话。

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和贺子珍住在离会场不远的一座两层小楼里。毛每天一早就出去，一直到夜晚才回来。贺子珍问他干什么去了，毛泽东总是说：“找人谈话嘛，就要开会了，得抓紧时间工作！”

由于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工作，反复宣传自己的正确主张，指出王明路线的错误，后来在会议上，他终于争取到与会者的多数，重新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上。

1935年1月8日下午，遵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回到家里，兴奋地对贺子珍说：“王明路线结束了，我也有了发言权。”

毛泽东与齐白石的友谊

1949年5月的一天，86岁高龄的国画大师齐白石在北京家中忽然收到人

民领袖毛泽东给他的一封亲笔信。毛泽东在信中邀请他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参加新政协会议，共商建国大计。齐白石高兴得几乎一夜没有合眼。为了表达对领袖的崇敬之情，他第二天就精心镌刻了篆文为“毛泽东”的朱文和白文两枚寿山石名章，托人献给毛泽东。

1950年4月的一天上午，毛泽东派秘书田家英到西城跨车胡同15号齐宅看望老人，详细询问了他的健康、生活及绘画等情况，并转告他毛泽东主席将于明天下午邀请他去家里做客。老人听后，兴奋得热泪盈眶：想不到一位国家元首，竟会邀请一个平民画家去他家中做客，这是自古以来所没有的事啊！

第二天一早，齐白石就起了床，专门穿上新衣服，对着镜子整了又整。刚吃过午饭，门外就响起了汽车喇叭声，他知道这是毛主席派车来接他了，便立刻拄着拐杖高兴地出来上了车。汽车驰向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工作和居住的地方。当时毛泽东已站在门前等候了。齐白石下了车，毛泽东便走到老人身边，搀扶着他。毛泽东与齐白石都是湘潭人。毛泽东操着浓重的乡音亲切地说：“我们是老乡，在家乡没见过，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齐白石紧紧握着领袖的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随后，毛泽东把客人请到书斋，拿出茶、糕点和糖果招待他，并和他热情地交谈起来。毛泽东问：“你老人家好多年没回去了吧？”齐白石数了数手指说：“有六七年了。抗战开始时回去过一次。长沙大火后，就再没有回去了。”“旧社会里你受了不少苦。现在好了，解放了，你可以安安心心画画了。”毛泽东说。齐白石听后激动地说：“这都托共产党和你的福。我想不到活了80多岁，到底还是盼来了这一天。”就这样，两个人从家乡的山水、风俗，谈到他们曾相识的许多友人的往事，以及绘画书法艺术等，不觉天色已晚。毛泽东笑着对齐白石说：“请齐先生在这里吃便饭。我们是老乡，都是湖南口味。”说着站起身，请老人进晚宴。这时，朱德总司令也来了，毛泽东给他们相互介绍了一下。席间，毛泽东不时地给齐白石夹菜，知道老人的牙不好，便多夹软烂的菜给他。朱德也不时地向老人敬酒，祝愿他健康长寿。毛泽东还告诉老人，国务院将聘请他提任中央文史馆馆员，齐白石沉浸在无限幸福之中。临别时，朱总司令亲自把他送上汽车。

齐白石回到家中，兴奋地对家人说：“这一天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天！我一辈子见过有名望有地位的人不计其数，哪里像毛主席这样诚挚待人、和蔼可亲的。他是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啊！”为了答谢毛泽东，齐白石在自己所画的精品中选出一幅1941年画的《鹰》，题上“毛泽东主席。庚寅十月。齐璜。”另外又选了一幅1937年书写的“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的篆书对联，一并送给了毛泽东。1952年，齐白石又和几位画家合作了一幅《普天同庆》献给毛泽东。毛泽东收到画后，亲笔给齐白石写了一封信：“白石先生：承赠《普天同庆》绘画一轴，业已收到，甚为感谢！并向共同创作者徐石雪、于非间、汪慎生、胡佩衡、溥毅斋、溥雪斋、关松房诸先生致谢意。”

1953年，齐白石90大寿，毛泽东特意送去湖南特产茶油寒菌和一对湖南胡开文笔铺特制的长锋纯羊毫画笔、一支东北野山参、一架鹿茸作为寿礼。

为什么毛泽东书信保存得这么全？

毛泽东写的信大都经过秘书登记后发出。为了保存毛泽东的手稿，毛泽

东的秘书田家英指定办信的同志将毛泽东写的信全文抄录一份以后，再发出去。有一次办信的同志将毛泽东亲自封口的一封信也拆开来抄录了。正巧毛泽东把这封信拿回去修改，拆信的事被他发现了。他很生气，说要处分。秘书室立即写了检讨报告，并申述抄录存档的理由。毛泽东看了检讨，觉得有道理，作了一个批示，大意是：好，就这么办。并指示，今后凡是他的信，除个别特殊情况，统统拍照后再发出。由此保存了一批珍贵文献，为后人研究毛泽东提供了重要史料。

毛泽东读诗知多少

毛泽东一生博览群书，尤其爱好中国古典诗词。

早在求学时期，毛泽东就广泛地阅读过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爱国诗人屈原的《离骚》和《楚辞》，汉代的乐府诗，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历代的诗、词、曲、赋、乃至鲁迅先生的诗作。他阅览过诗话、词话、音韵、词律等书籍。

据毛泽东同志故居（中南海）的工作人员张贻玖同志的统计与研究，在毛泽东的藏书中，毛泽东亲自圈划批注过的诗词中有 1180 首诗、378 首词、12 首曲、20 篇赋，总计 1590 首，诗人达 429 位。其中，唐诗约 600 首，汉、魏、南北朝时期诗人的作品 150 多首，明诗近 200 首，鲁迅诗中划过的有 44 首。

这些统计，仅限于毛泽东在解放后逐渐积累的藏书中圈划过的诗词。至于他读过而未留下印记的以及散失在各地的诗词究竟有多少；在井冈山、中央苏区和延安，他读过多少古典或近代的诗词，都已无法统计。

毛泽东的遗体解剖

北京军事医学科学院著名实验病理学专家刘雪桐研究员在谈到毛泽东遗体保存时说：毛泽东的遗体解剖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抓“四人帮”之前，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封建迷信登峰造极，奉毛泽东为神，当然，对毛泽东的肌体什么也不准动，连“解剖”这一术语也避讳，只宜说给主席“手术”。毛泽东遗体的内脏取出后，自然不便按科学的常规来处理，因为封建迷信思想绝不是仅仅把“四人帮”抓起来就能消除的。刘研究员说，毛泽东病逝于心血管疾病，其他内脏器官都是很好的。

毛泽东遗体保存的防腐措施与一般防腐措施差不多，也是采用血管内灌注和浸泡固定的办法。只不过所用药品器材，要么是高纯度的，要么是最优质的。其中更多的是用来体现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从科学角度看，形而上学的内容也是有的。

刘研究员告诉记者，毛泽东遗体的保存系统，是非常复杂和精细的，它集当代有关科学技术为一体，可以说是一个现代化的特殊工厂，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毛泽东遗体保护得很好，身上没有收缩，毛泽东逝世一周年时测量为一点七八米。要求毛泽东遗体千秋万代不变，不是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根据现代科学技术来预测，保存遗体一二百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至于后人如何评议保存毛泽东遗体，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发展，会有人感兴趣的。

毛泽东的水晶棺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决定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纪念堂。但是，要保存好遗体，必须使用特种材料做的棺材。有关部门参考国内外资料，决定采用水晶棺材。然而，这种棺材原料属贵重稀有矿产，一般一个水晶棺起码要用10吨的一级熔炼水晶冶炼，谈何容易。正由于这个原因，目前世界上除个别国家元首使用以外，即使亿万富翁也是极少使用的。在我国近代，也只有孙中山先生使用了水晶棺。

10月下旬，海南岛水晶矿接受了任务。这个矿当时每月只有生产水晶3.5吨能力，而一级品仅占百分之八；即使扣去库存原料，正常完成任务起码需要90天，可是按照需要，必须在40天内完成！怎么办？水晶矿党委果断决定：选矿车间连轴转；机关、后勤上一线；停止采掘，全部人员加入选矿行列。1977年2月10日，终于提前一天完成了任务，这批价值数十万、国内外少有的优质一级熔炼水晶被专人护送到冶炼厂……

1977年8月29日，当世界上少见的高级水晶棺，安放着一代伟人的遗体移入毛主席纪念堂。同年9月9日，正式开始接待瞻仰者。

刘少奇同志订立的“四不准”

少奇同志向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亲自交代了“四不准”规矩：

1. 每到一地，不要人家接送；
2. 到任何地方，不准请客吃饭、铺张浪费；
3. 不准向人家要东西；

4. 参观时不要前呼后拥地陪同，有个向导引路就行，不要影响地方同志的工作。1961年少奇同志到湖南蹲点。出发之前，他告诉工作人员，要轻装简行象过去打游击一样，下去自带行李，自带碗筷。原来派了轿车，他不肯坐，坐了吉普车。少奇同志说，吃饭一菜一汤就行了。

刘少奇骨灰海葬内情

1980年5月17日，刘少奇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他生前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表示：在他故去之后，一定要把他的骨灰撒到海洋里去，不要存留人世。自打刘少奇主席的骨灰从河南接回到北京，放进人民大会堂的灵堂时，亲属们就开始轮流守灵，并相约要一直守到把骨灰撒完为止。

5月18日上午，中国革命博物馆来人提出要求说：毛主席进了纪念堂，朱老总进了八宝山，周总理撒向了江河湖海，少奇同志的骨灰就存放在我们这儿吧，应该让人们更多地看到他，并由此想到与他的名字紧紧相连的那场浩劫中党和国家所遭到的巨大创伤！亲属们认为这是一个无从考虑的要求，因为它与少奇同志的遗愿不符。

中午时分，电话传来一个消息：刘伯承元帅在得知少奇同志的骨灰仍未能如愿撒向死者生前渴望的海洋后，主动面陈中央，请求将这一任务交由海军执行，并表示我人民海军必以强大阵容和整肃的队列，满足故人和全国人民的心愿。午后，得到通知：中央书记处经过讨论，已同意由海军执行撒灰任务。

5月19日早晨8点多，灵车队疾速驰向北京西效飞机场。由于事先得到有关方面的通知，王光美同志开始只指定让几个儿女辈们去！但小二（婷婷）则坚持说：想去的都能去！后来王光美只得让大家先跟着去，如果机场没人阻拦，就去吧。

候机楼里里外外挤满了得到消息后赶来送灵的人们。与送别的人们一一握手后，王光美等几人捧着骨灰盒登上了飞机，在机舱门口，源源忽然转回身来，手捧骨灰盒，高举过头顶，向着站在舷梯前的人群大声说：永别了！场上顿时响起一片愈扬愈高的痛哭声。后来，几个小辈及其他几个人也被允许上了飞机。

10点钟，飞机降落在青岛附近的一个海军机场，打开舱门时，只见两列持枪脱帽、垂手肃立的水兵，从舷梯旁一直排列到接灵车前，组成接灵仪仗队。汽车开出机场的路上，到处是三三两两的海军官兵，军官右手行军礼，士兵则左手托帽，垂手肃立。

灵车驶入军港，海军官兵全部行致哀军礼；而海港里所有的工人和机器设备也都停止了工作和运行；港口里中外大小船舶，都下半旗致哀。军舰离岸时，送灵的亲属们排成一列，向深情的青岛人民，向岸上庄严肃立的海军官兵们三鞠躬致谢。

刘少奇主席海葬的遗愿终于实现了。

周恩来的巴黎斗室

坐落在巴黎意大利广场附近的巴黎13区戈德弗鲁瓦街17号，是一家只有24个简陋单身房间的小旅馆。这就是周恩来总理青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旧居。

旅馆的正面墙上，悬挂着一块墨绿色的大理石纪念牌，牌上镶着周恩来总理的半身铜像，于铜像下面写着：“周恩来（1898—1976），他于1922—1924年在法国期间住在这所房子里。”这块纪念牌出自法国某艺术家之手。

20年代，周恩来住在该楼三层拐角处16号房间。轻轻打开门，这只是一间不到5平方米的黑漆漆的斗室。室内除一张单人床、一个洗脸盆和一把凳子外，便无他物。

戈德弗鲁瓦旅馆16号房间将被辟为永久性的纪念室。它已成为中法两国人民友谊的永恒见证。

周恩来入党介绍人是谁

“五四”运动后，中国大批爱国青年为探求救国真理，纷纷到欧洲去求学。当时，蔡元培、吴玉章等从为祖国培养人才出发，发动了勤工俭学运动。从1919年至1920年，前往欧洲求学的达1500多人，其中四川省为最多，有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承等；次之是湘南，有蔡和森、向警予、蔡畅、徐特立、李富春、李立山等；从京津去的有周恩来、陈延年等。王若飞是从贵州去的。

在法国的共产主义小组，是陈独秀委托张申府在勤工俭学的学生中建立的。1920年12月，张申府到法国，第二年初，他介绍刘清扬加入中国

共产主义小组，随后又与刘清扬一起介绍周恩来加入。1922年冬，成立了中共旅欧总支部。

周恩来的一段报人生涯

1919年6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不久以母校南开大学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领导工作，而且积极筹备出版《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担任了《会报》的主编，并亲自写了以《革心，革新！》为题的发刊词。

7月，周恩来冒着盛暑，来到天津南市区荣安大街的协成印刷局里校对稿件，还和工人一起排字，搬运纸张，拼版印刷，折叠报纸。就这样，一张张《会报》印了出来。这家宣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道理的报纸，深受群众欢迎，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共鸣。

不久，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会报》从3天出一期改为日报，工作更紧张了，周恩来索性把办公室搬到协成印刷局旁边的一间小屋里。他改编完稿件以后，立即到印刷局和工人们一道工作。他和工人亲密相处，耐心回答他们的问题，关心他们的生活，用真理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

1919年8月6日，《会报》上刊登了周恩来题为《黑暗势力》的文章，向民众披露学生爱国运动史上刚刚发生的“山东惨案”，它像火种一样点燃了广大群众的怒火，产生了巨大的号召力。天津各界联合会决定赴京请愿。

8月23日，反动当局抓捕了全部请愿代表。消息从北京传到了《会报》编辑部。他们立即召开了会议，周恩来作了请愿情况报告。为了加强舆论的力量，营救被捕代表，决定赶出一期“号外”。在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下，反动当局不得不在8月30日将被捕代表全部释放。《会报》的这期“号外”在我国报纸的史册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周恩来免遭空难纪实

1954年4月初，经过党中央研究、决定，派以总理周恩来为首，副总理陈毅为副的代表团出席印尼万隆亚洲非洲会议。同时，决定包用印度国际航空公司的星座式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前赴印尼万隆。

4月3日，北京公安局特别为此事通知驻各地的工作人员，密切监视美国和台湾方面的动静，以保证出席这次亚非会议的代表团的安全。两天后，即4月5日晚上12时，一位从香港返回广州的广东省公安厅侦察人员，专程从广州赶到北京，汇报说：“美国和台湾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已获悉代表团的行踪，有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第二天凌晨3时，周恩来接到了这个紧急情报。他立刻把公安部的负责人召来，要他们迅速核实情报的准确性，以便采取相应的措施。

4月10日晚上，周恩来回到中南海家中，他向邓颖超透露了这次赴印尼万隆是乘印度航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并透露中间出了一点问题，但现在已解决了。他说：“蒋介石太蛮了！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我前去万隆，当年重庆百万禁军之地我也敢闯进去，难道这小小的威胁就能难倒我吗？”晚饭后，毛泽东碰到邓颖超，听邓说“出了一点小麻烦”，马上警觉起来，他当时沉吟不语，没说什么。但他返回家中后便拨了个内线电话，把周恩来邀到

他的书房，详详细细地问清了事情的经过。毛泽东经过考虑，便断然决定了一个根本没有第三者知道的秘密措施。

第二天，即4月11日上午，当印度航空公司的航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准时在北京机场降落，中共代表团和越南代表团部分成员，以及新闻记者等11人，登上了这架飞机。北京机场的保安措施异常严密，甚至连惯常的送行仪式亦取消了，任何人都不知道上这架飞机的是什么人。

上午12时15分，这架飞机按原计划在香港稍事停留，加油后飞离香港。5小时后，当飞机正在北婆罗洲沙捞越北的海上空飞行时，机上突然传出一声闷人的爆炸声，火势迅速蔓延四处。飞机像一团火球似的扑入大海，并产生了猛烈的爆炸。

“克什米尔公主”号坠毁的消息，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在台湾，当时就有人发出贺电，欢呼周恩来的死是“反共复国斗争的一大胜利”！

邓颖超最初听到消息时，非常紧张，正当她要出去打探消息时，却接到毛泽东要她放心的口讯。原来，当毛泽东获悉事前接到的情报内容后，马上强迫周恩来接受他的安排，连夜乘飞机秘密提早出发，而登上“克什米尔公主”号的中国代表团只是一些随行工作人员。而事前一切消息都加以严密封锁，甚至连邓颖超亦不知情。

香港政府经过严密调查，终于查到台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头上，事实终于证实：“克什米尔公主”号确实是在香港被台湾特务放上定时炸弹的。

周恩来劳山脱险记

1937年6月上旬，为了团结抗日，周恩来和张云逸同志离开延安，准备经西安前往南京，同国民党继续商谈关于红军改编的问题。

当时，陕北红军没有小汽车，只有几辆破旧的大卡车。周恩来一行数十人就乘大卡车前往西安。周恩来坐在驾驶室里，后面车斗里坐着几名干部和两个警卫班。

早上，车子从延安出发，沿着山路艰难地向前爬着。不料，这一行动被土匪知道了，他们就在途中设下埋伏，妄图袭击周恩来。当卡车行至离延安40里的劳山时，四周突然响起了枪声，二三百名土匪凭着两侧山头，居高临下，以密集的火力围攻大卡车。司机当场殒命。情况万分危急！周恩来急速跳下车子，一面沉着地指挥随行人员向敌人还击，一面率部向密林深处撤退。退到三十里铺后，当地驻军立即组织小分队，向劳山追去。

为了掩护同志们转移，参谋陈有才不幸中弹牺牲。敌人在他身上搜到一张周恩来的名片，便以杀害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又见红军援兵赶来，便仓惶逃走了。

周恩来八次历险记

1927年3月21日，上海爆发了以周恩来为总指挥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此后不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周恩来被上海叛军二十六军二师师长斯烈扣押，生命危在旦夕。罗亦农立即设法通过二十六军党代表赵舒，直接找到斯烈要人，周恩来才得以虎口脱险。

红军长征途中，一天晚上，周恩来发烧至39度以上，昏迷不醒。当时医

生不在，药也没有，警卫员只好用冰水给他冷敷。几天后，他竟然从死亡线上挣扎出来。

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一些东北军少壮派军官杀气腾腾地冲进周恩来的办公室质问。周恩来临危不惧，用实际行动挫败了敌人的阴谋。

1937年4月26日，周恩来一行32人，由陕北乘卡车去西安。不料国民党顽固派收买了一批政治土匪埋伏在路旁的制高点上疯狂射击。车内多人负伤，周恩来立即跑下汽车，指挥大家还击，冲出了敌人的包围。

1938年11月12日夜，在长沙布置工作的周恩来与叶剑英在八路军“湘办”和衣而睡。这天，蒋介石下令火烧长沙，“湘办”也陷入火海。幸而工作人员邱南章被惊醒，救出已临险境的周、叶。

1939年7月10日，周恩来骑马赴杨家岭开会，返回时，江青在前突然猛勒马缰，与后面周恩来的马眼看就要相撞，周恩来只好全力勒马，坐骑直立起来，把他摔倒在路边大坑里，当时臂骨断裂，肘腕骨突出，终成伤残。

1949年1月30日，周恩来从延安飞往重庆。飞机飞越秦岭时突然遇到冷气团，急速向下坠落。机长要大家准备跳伞，但同机的叶挺之女杨眉没有伞包。周恩来迅速解下自己身上的伞包给杨眉系上。刹那间，飞机冲出了冷气团终于脱险。

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参加万隆会议，台湾当局雇歹徒趁飞机在香港加油时安放了定时炸弹。4月11日午后，客机在飞越北婆罗洲海面时爆炸坠海，机上人员大部遇难。周恩来因临时先去仰光，使敌人计划未能得逞。

周恩来巧语解“十三”

为了安排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行政事务与后勤工作等问题，美国派了一个以黑格为首的先遣队先期来华打前站，于1972年1月3日到达北京。

1月6日晚上，周恩来与黑格举行正式会谈。在此之前1月4日，周恩来接见黑格一行时候，黑格在讲话中流露出一种帝国主义观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与关注。黑格讲，美国方面关心中国的生存能力，所以我们双方有共同点，可以共同对付前苏联。周恩来6日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与黑格会谈，重点就是要解决他这个思想。这是有针对性的，意在使尼克松来华之前就不能抱有美国是来保护中国的思想，等于通过解决黑格的观点，给美国方面一个重要信息。

黑格听了周恩来的批评，自觉理亏，满脸通红地说：“很抱歉，我可以收回那句话。”

1月7日黑格一行飞往上海。他们要按预定的尼克松总统的访问路线，事先走一遍，落实打前站的各项工作。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徐景贤讲话祝酒。黑格不懂中国的礼节，没有站起来，也没有致答词。当天晚上，徐景贤等那帮人大为恼火，认为黑格瞧不起上海领导人，说要整整黑格。

第二天，在黑格去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的时候，华盛顿方面发表了一个关于“两个中国”的不大友好的讲话。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等竟在参观途中把黑格叫出来，提出严重抗议。黑格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十分吃惊。上海那帮人还不表示罢休，又打电话到杭州，让杭州接待“降温”。于是黑格

一行在杭州到处遇到冷面孔。为此章文晋打来长途电话报告给周总理。在黑格离开杭州的头天晚上，周恩来打来长途电话说，毛主席授权他批评这种不顾大局的做法。说黑格到上海，接待要“加温”；还说毛主席关照，美国人爱吃糖，每个人送10斤。

第二天，黑格一行从上海过境飞回美国。上海那帮人全跑到虹桥机场，举行盛宴，排着队逐次给黑格敬酒，最后临上飞机时，又送给他们每人一盒10斤重的糖。上海那帮人前倨后恭，把黑格弄得莫名其妙。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总统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他的书房里会见了尼克松和基辛格。2月25日，双方达成协议，尼克松和基辛格为此兴致勃勃。可是，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看了公报稿，却嘀咕不理想。随后罗杰斯送交总统一份材料，列举了专家们的种种修改意见。

在大功告成之际，美国国务院的专家们又横生波澜，把尼克松几乎气疯了。

在刘庄宾馆的客厅里，尼克松走来走去，脸色都变了。他又气愤又痛苦。他既不便向中方提出重新讨论，又不能带一个分裂的代表团回国，左右为难。周恩来听了乔冠华的汇报，也听了为罗杰斯当翻译的章含之的汇报，心里一直琢磨这件事。他了解美国国情，清楚白宫和国务院的矛盾。他想到毛主席接见尼克松时，罗杰斯没能去，正想到上海后要特别去看望罗杰斯，补一下课。

2月27日尼克松总统一行到达上海，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住在15层，基辛格住在14层，罗杰斯、格林和其他国务院官员住在13层……”

周恩来特地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的标志牌上的“13”处亮了红灯时，周恩来恍然大悟似地说：“怎么能安排他们住第13层？西方人最忌讳13……”

周恩来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那些官员站起向身，但笑得很不自然。周恩来在寒暄中，特别强调了国务院对美兵队来访的支持。随后他说：

“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对‘13’的避避。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周恩来走后，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和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而对周恩来则十分倾倒。

周恩来巧答美国记者问“路”

一次，周恩来接见外国记者：有个不怀好意的美国记者挑衅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呢？”周总理机智而自豪地回答是：“我们中国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就叫马路。”这名美国记者不死心，又想出一个难题：“总理阁下，在我们美国，人们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这又怎么解释呢？”周总理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美国走的是下坡路，当然美国人是仰着头走路的；我们中国人走的是上坡路，当然是低头了！”

周总理来写电影说明

1954年周恩来参加日内瓦会议，听一位美国记者说：“在日内瓦看不到共产党统治下几亿中国人民的悲哀和愁苦。”后来他便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放映《一九五二年国庆节》，全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但又有个美国记者说：“这部影片说明，中国在搞军国主义。”周恩来说，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越剧彩色片）。工作人员便准备了一份长达十五六页的说明书，周恩来批评他：这是“不看对象，对牛弹琴”。那位工作人员不服，说：“给洋人看这部电影，才是对牛弹琴呢！”周说：“就看你怎么弹法，你要用十几页的说明书去弹，那是乱弹。我换个弹法，只要你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利叶》’”

果然，那天外国记者都来了。放映前用英语作了3分钟说明，观众看得如醉如痴，最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有的说，中国还在进行朝鲜战争中，拍出这样的片子说明中国的稳定，这一点比电影更有意义。后来又在更大范围内放映了几次，许多社会名流赞声不绝。

周总理与释迦牟尼像

1956年，杭州灵隐寺重新修建。负责设计释迦牟尼像的华东美术学院将佛家祖师的发型弄成波浪式。灵隐寺的方丈性空和尚根据他的渊博学识，认为佛祖的发型应当是螺旋式的。双方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周总理知道此事后，毅然支持性空和尚，说：“应当尊重佛教界人士的意见。”事情总算一锤定音。

1957年周总理到尼泊尔访问，一天，主人送给周总理一尊木制的释迦牟尼像。总理说了一番友好的话，表示谢意。翻译同志用英语翻译时把一个物称的关系名词用在释迦牟尼像身上，周总理立即用了一个人称的关系代名词予以纠正。事后，周总理严肃地指出：“尼泊尔是一个佛教国家，你们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注意。”

周恩来“一”字评霸王

1960年，周恩来在北京审查出国节目。其中对京剧《霸王别姬》，每个重要场景的评语都只有三四个字，而且都是以“一”字打头。

当戏演到项羽不顾形势，不听劝阻，执意出战时，周恩来评道：“一言堂。”

项羽回后宫，虞姬规劝再三，千万不可发兵，以免中刘邦奸计。项羽不容分说，回绝说：“孤意已决，明日发兵！”周评道：“一家之长”。

项羽孤军深入，落进了刘邦的伏击圈。周又评曰：“一意孤行。”

项羽终困垓下，周评曰：“一筹莫展。”

戏演到虞姬备酒，项羽吟唱“力拔山兮”时，周恩来再评曰：“一曲挽歌。”

项羽四面楚歌，汉兵将至，虞姬自刎。周恩来指出：“一败涂地”。

周恩来同志的十条“家规”

据国务院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讲，周总理生前有这样十条不成文的“家规”：

1. 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看望他，只能出差顺路时可以去看看。
2. 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
3. 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票，没工作的总理代付伙食费。
4. 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
5. 不许请客送礼。
6. 不许动用公家的车子。
7. 凡个人生活能自己做的事，不要别人来办。
8. 生活要艰苦朴素。
9. 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
10. 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

周总理经常对晚辈说：“永远不要搞特殊化，要特殊的话，那只能在工作上做出特殊成绩来。”

周总理逝世联合国为何降半旗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联合国决定下半旗一周表示哀悼。当时有的成员国代表表示反对，联合国秘书长说：“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的总理终身只有一个夫人？有哪个国家的总理终生受人民爱戴？在国外银行无一分钱私人存款”？反对的人无言以对，决定顺利通过。

周恩来骨灰播撒记

周恩来遗体于1976年1月11日火化后，骨灰暂时安放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

1月15日上午，在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上，Z首长和G首长在几个随从的陪同下，来到机场招待所的会议室，将空军某运输团一大队二中队副中队长胥从焕、飞行员唐学文召到会议室，亲自向他们交代一项重要飞行任务。Z首长说：“我代表国务院、中央办公厅向你们直接下达播撒周总理骨灰的飞行任务，因为任务的机密程度很高，所以，这是党对你们的信任。”接着由一位高级参谋把事先画好的飞行航线图铺在桌子上，讲解航线和飞行注意事项：起飞地点是通县机场，经汤河口、密云水库东10公里1049米的山头、天津、北镇（黄河边），再回通县机场降落，高度2000米。

执行任务的飞行机组成员包括：正驾驶、副中队长胥从焕，副驾驶、飞行员唐学文，领航员白海坤，通讯员李永顺，空中机械师、机务副中队长陈宝森。使用的飞机是前苏联制造的安—2，出厂号码“1732027”，机尾编号“7225”，是执行农业飞行任务的专用飞机，装备有整套喷撒农药的机械设备。机组成员接受任务后，就被转移到机场内滑行道旁的一座独立小楼中。飞行准备进行完毕后，他们就留在小楼内休息，由交代航线任务的那位参谋

站门岗，除 Z、G 两位首长外，任何人不得接近。当时，指挥所之间的通报只讲：“有重要飞行任务，具体起飞时间由在机场的 Z 首长确定。”

当天黄昏，胥从焕机组成员登上“7225”号飞机，作了一次试飞，飞机和喷撒设备的运转情况都很正常。试飞之后，Z 首长和那位高参都陪着机组成员守候在“7225”号飞机旁，一步也不离开。

与此同时，守候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门口的中、外记者们，时刻以敏锐的目光观察着院内的动静。只见一辆高级轿车在几辆公安摩托的引导下，驶出了文化宫大门，经过天安门广场，沿着长安大街向西开去。成群的记者们立刻驱车尾随而去。在高级轿车西行之后不久，文化宫的大门再次打开，从里面又驶出几辆破旧的吉普车，出大门后沿长安街向东转弯驶去。这几辆吉普车自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谁知，就是这几辆很不起眼的破旧吉普车，执行着运送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19 点 50 分，这几辆吉普车驶抵通县机场。直接开到“7225”号飞机旁。暮色中，从车上走下 6 个人，身着大衣，头戴皮帽，匆匆走向飞机。这 6 个人抱着 4 包大约 30 厘米长、15 厘米宽的白布口袋，在 Z 首长的护送下上了飞机。20 点 15 分，飞机从通县机场起飞。

胥从焕根据乘机首长的要求，在飞经密云水库上空、高度 500 米时，第一次拉了播撒把手，将骨灰撒在湖泊中，在飞经天津市上空时，第二次拉了播撒把手，将骨灰撒在周恩来青年时代学习和从事革命活动的地方。在黄河边的北镇，他第三次拉了播撒把手，将骨灰播撒在代表伟大的中华民族历史摇篮的黄河沃土上。至此，播撒骨灰的任务全部完成。

1 月 16 日零时 45 分，飞机安全降落在通县机场，整整飞行了 4 个半小时。

播撒周恩来骨灰的过程，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和照片。就连《敬爱的周恩来永垂不朽》电影中那个唯一的飞机播撒骨灰的镜头，还是以后补拍的。然而，周恩来将永生在中国人民的心中，始终不灭。

邓小平发明的“蚊帐”

1930 年夏，广西右江。一天，26 岁的邓斌（即邓小平，时任红七军政委）在摆脱一个连白匪的追赶中，不小心把腿摔伤了。在这紧急关头，正巧我地下党一个外号叫“金钢锥”的交通员经过这里。“金钢锥”赶紧背起邓斌，路过布柳河（在百色附近），钻进离河不远的的一个旧瓦窑里。

瓦窑里阴森潮湿，蚊子特别多，随手一抓就可以抓到好几个，两人被叮得吃不消。不一会儿，邓斌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两人悄悄来到洞外。捉了许多非常善于结网的花背蜘蛛，把它们放在洞口网。同时，又挥动衣服向外赶蚊子。过了一会儿，他们欣喜地看到，蜘蛛竟结起了好几张大网，网上粘住了不少企图从外面飞进来的蚊子。就在这时，追赶邓斌的白匪过了布柳河，搜索到了窑洞口。洞内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连长便命一个排长进去瞧瞧。排长害怕，推班长，班长又推士兵，一个士兵无奈，只好硬着头皮蹑手蹑脚地走向洞口。他还没走上几步，突然发现了洞口有许多蜘蛛网。于是，赶紧回过身来，对连长说：“蜘蛛网都没破，哪有什么人进去呀！”连长听了觉得有道理，于是把脑袋一歪，骂了一句脏话，带着队伍又去别处搜查了。

邓斌发明的“蚊帐”，不仅能挡蚊子，而且还迷惑了敌人。这个消息很

快在红军中传开了。从那以后红军每到瓦窑或山洞里宿营，总要找些蜘蛛来结网，有人还风趣的说：“这是邓政委发给我们的蚊帐！”

邓小平主编《红星报》

30年代初，红军总政治部办了一份机关报《红星报》，邓小平是该报的主编。在编辑部，邓小平除有一个技术帮手外，当时既要审阅、改写稿件，又要编排版面，还要负责书写标题和校对。据统计，这份办得很有特色的《红星报》，先后共办了《列宁室》（理论学）、《军事常识》、《军事测验》、《卫生常识》、《俱乐部》和《铁锤》、《法厅》等专栏和文艺副刊17个。其中的《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讨论。《法厅》副刊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刑法处罚的案件，这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还刊登歌曲，深受红军指战员欢迎。如有一首人民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山歌：“一双草鞋一片心 / 难为后方姐妹们 / 穿上草鞋跑得快 / 红军哥 / 赶快冲上南昌城。”当时就流传很广。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军民称这张《红星报》为“大无线电台”。

《双猫图》送给邓小平

邓小平家中挂有一幅《双猫图》。图中，一只猫毛色雪白，茸毛轻柔；另一只猫毛色乌黑，黑里透亮。两只猫一前一后，缓缓前进。那毛茸茸的身体，那炯炯有神的眼睛，十分惹人喜爱。

《双猫图》的上方，是几行遒劲苍老的题辞：“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就是好猫。”

落款处，端端正正地写着：

小平同志雅正 海石老人

陈莲涛时年八十三

这位自号“海石”的老画家就是被人誉为“江南猫王”的陈莲涛。

为了仔细观察猫的形态活动，陈莲涛四处搜寻，养了十几只品种各异的猫：有金丝猫、梅花踏雪猫，有雪地拖枪、金顶挂印、金床银被猫，有波斯的鸳鸯眼白猫、英国的狮子猫……家里简直成了猫的世界。陈莲涛几乎终日与猫为伴，时时捕捉猫的跳跃、嬉戏的动作，就是连细节也不放过：如猫的前脚有六掌五爪，后脚有四掌四爪；猫的眼睛有圆形，有三角形，也有凤眼形的。这样，他胸中有猫，在创作时便可随心所欲，淋漓尽致地刻画出猫的各种神态。难怪别人说，陈莲涛笔下的猫形神兼备，大有呼之欲出之势。

解放以后，陈莲涛的作品在全国美展中多次展出，特别是他的猫，那眼睛似嗔、似媚、似怨、似诉，神态各异，惹人喜爱。陈毅、荣毅仁、梅兰芳、姜妙香都很欣赏他的猫画，并收藏了他的作品。

1984年，邓小平得知“江南猫王”仍健在，便托人捎信给陈莲涛向他致意。陈莲涛得悉邓小平同志在百忙中还记着自己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画师，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他精心构思，一丝不苟，画了一幅《双猫图》，托人敬献给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同志的女儿也是画家，看到《双猫图》后爱不释手，向父亲要这幅画，父亲当然不给。于是她托人请陈老再画一幅。陈莲涛欣然命笔，画了一只活灵活现、可意媚人的小花猫赠给她。

“您真难找啊！”

1937年美国女记者海伦从西安只身前往延安采访，当时恰逢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所以海伦有幸见到40多位中央领导人，唯有任弼时、邓小平已率领部队前往云阳镇。海伦深感遗憾，就以特有的钻劲找到毛泽东，请求帮助解决。毛泽东亲笔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介绍海伦的信。海伦带着这封信立即前往云阳。可是当她赶到云阳时，邓小平已率部开赴抗战前线，无缘得见了。

中美正式建交后，邓小平于1979年代表中国政府前往美国访问。海伦喜出望外，即刻从家乡康奈狄州前往华盛顿，执著地设法要见邓小平，并且终于如愿以偿了。见面时她第一句话就说：“您真难找啊！”她兴奋地把自己珍藏了42年的毛泽东亲笔信交给了邓小平。

邓小平妙语拟电报

1948年，刘伯承、邓小平同志遵照毛主席“打到长江，站稳脚跟”的指示，率领大军向长江挺进。老作家康濯当时在军部负责文书工作。部队打到长江边的襄樊一带，决定拟一个电报向毛主席回复。康濯和一些“秀才”们作了许多文章，但都觉得不满意。正议论间，邓小平同志进来了。他听了大家的汇报后稍一沉吟，说：“这个电报由我写算了。”接着，他便念出了电报的全文：“毛主席，我们打到了长江，站稳了脚跟。”全文15个字，言简意赅。

瞿秋日英勇就义的详情

瞿秋白慷慨就义后，天津《大公报》1935年7月5日登出专稿，详细而生动地描绘了秋白同志就义的悲壮场面。全文是：

（长汀通讯）瞿秋白系共党首要，本年3月中旬，于长汀永口地方保安14团钟绍奎将其俘获，当时瞿犹变名为林祺祥。拘禁月余，莫能辨认。后呈解长汀，经36师军法处反复质证，彼乃坦然承诺，于是优予待遇，另辟闭室。时过两月余，毫无讯息。今晨忽闻瞿之末日已临，登时可信可疑，记者为好奇心所驱使，趋前叩询，至其卧室，见瞿正大挥毫笔，书写绝句。书毕，至中山公园，全园为之寂静，鸟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见菜4碟，美酒一瓮，彼独坐其上，自斟自饮，谈笑自若，神色无异。酒半乃言曰：“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我们共产党人的哲学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高唱国际歌，打破沉寂之空间。酒毕，徐步赴刑场，前后卫士护送，空间极为严肃。经过街衢之口，见一瞎眼乞丐，回首一顾，仍有所感也。既至刑场，彼自请仰卧受刑。枪声一发，瞿遂长逝人世矣！

这份史料是记者亲眼所见，真实可信。另外，它较快地披露了秋白就义的消息。敌人杀害瞿秋白后，严密封锁消息。即使居消息灵通之地上海的鲁迅，闻知挚友噩耗时，已8月底了，党中央也是好久以后才晓秋白遇害。

瞿秋日《多余的话》的真伪

1989年冬天，由中共党史学会等举办的纪念瞿秋白诞生9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常州召开时，会议围绕瞿秋白政治、思想、理论和人生观等展开了讨论。

会议在讨论到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时与会者认为，《多余的话》肯定是伪托。理由是：深知瞿秋白的鲁迅，早在30年代，就已予否定。当时郑振铎曾通过内部关系查阅登载《多余的话》的《逸经》杂志的底稿，只是手抄本，而未见手迹。如系瞿秋白的原作，在《逸经》杂志社应能见到手迹。既然瞿秋白写了《多余的话》，其中有不少自污的话，国民党为什么又把他杀掉？为此，也有人提出对《多余的话》可以研究，但不要公开地肯定它是真的。

也有与会者认为，《多余的话》是真的。其理由是：瞿秋白在汀州系狱时，有给郭沫若的遗札可以佐证；还有瞿秋白在狱中写的诗词也可佐证；毛泽东、周恩来等也肯定是真的；同代人的评论，大多认为属实，尤其是为曾在上海大学受业瞿秋白、并深知其人的丁玲肯定。

谁安葬了陈独秀

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病逝于江津偏僻的山村鹤山坪，终年63岁。他晚年流寓江津，生活相当困难。蒋介石曾派人游说他就任“劳动部长”一职，被他断然拒绝，最后贫病而死。邓燮康敬重他的人品，便捐赠在江津大西门外鼎山麓住宅前一块空地，安葬了陈独秀。衣衾棺木均由邓一家务办，还在墓前立了一块石碑。墓碑上刻着：“独秀陈先生之墓”。据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资料介绍：“……惨加葬仪者，有朝野学者名流三四十人。左右乡邻壮丁不期而会者一二百人，沿途护卫，且放鞭炮以示景仰惜别之意。”1947年，陈独秀的遗骨迁葬安徽安庆市北郊，重立墓碑。碑刻“先考陈公仲甫之墓，子延、乔、松、鹤年泣立”。

邓燮康营葬陈独秀一事，曾使他遭到过不公正的待遇，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有关方面才根据史料重新作出评定。

邓燮康，江津白沙人，192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市政系。1930年担任邓氏家族兴办的聚奎学校校长，一生致力于办学，服务于桑梓。抗战期间曾聘请一些知名人士、进步学者来校工作，陈独秀生前也在聚奎学校居住过，他因亲见邓燮康的叔父邓蟾秋捐出巨款为学校修建大礼堂，设立“蟾秋奖学金”，还在重庆建立了“蟾秋图书馆”，“遂以敬佩之心亲笔为邓蟾秋题写了四个篆字：“大德必寿”。这四个字镌刻在白沙黑石山鹰嘴岩上，保存至今。

李立三的最后岁月

李立三是中国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1921年入党，曾担任过党中央的领导重任，因此掌握了不少老干部的重要情况。在文革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挖空心思想，妄图从他这里发掘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罪证”。但李立三十分坚定地说：“我过去犯过严重错误，什么时候都可以批判，落井下石的事我决不会干！”

李立三的刚正气节，触怒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1967年6月5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操纵下，一个有58个造反组织参加的“批斗李立三反革命集团联络站”成立，30天的时间内批斗李立三的大会就达14次之多，经常还有三五成群的人到家里查抄、批斗、审讯。他在精神和肉体受到极大摧残的时候先后五次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写信。6月20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写信，刚写到第六页时，揪斗的人已走近家门，他把没写完的信赶紧藏在褥子底下。还没来得及同家人告别就被揪走了。

接着，李立三被关押在北京三里河一公寓内。6月22日上午，他时而痛苦地仰天长叹，时而茫然地看着墙上检举揭发一类的标语，他吃不下，坐不住，一支接一支地吸着香烟，心灵的折磨已使他精神崩溃了。中午，他趁着守去买饭的空隙，挣扎着给毛泽东写下了绝命书：

我给您写了一封长信，还没有写完，在褥子底下；请您派人去取。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李立三绝笔 1967年6月22日

写毕，他从贴身衣袋掏出一包美国产安眠药，和着白开水，将50粒药全部咽下肚去，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安详地躺在床上。当看守带饭回来时，只见夹在李立三指间的香烟青丝袅袅，人却已经昏睡过去。送到医院，已经无法抢救了。李立三的遗体，被挂上“服毒者李明”的牌子而火化，他的前苏联妻子李莎和两个女儿，第二天被捕入狱，其罪名是指使李立三自杀灭口。

李立三有三次追悼会

在李立三同志的有生之年和去世以后，曾为他先后开过三次追悼会。

周恩来总理曾经在一次闲谈时开玩笑说：“李立三活着的时候，我就为他主持了两次追悼会，所以，他一定会长寿的。”但是他被林彪、江青迫害，没有能长寿。

1922年秋，当他任中共安源煤矿支部书记、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主任，领导安源工人罢工的时候，意外的消息传到在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说李立三领导罢工失败后被敌人逮捕并杀害了。于是，由周恩来、王若飞、赵世炎同志主持，在法国巴黎郊外的华侨协社，为李立三同志开了追悼会。1922年10月1日旅欧少年共产党的机关刊物《少年》第三期，还登载了用黑框圈起的《一个悲壮的报告》：“郑重地向朋友们报告这个噩耗”。不久，安源罢工胜利和李立三同志还健在的消息又传到了法国，那里的同志们高兴地笑了起来。

1927年8月，李立三同志参加了著名的八一南昌起义。在从南昌城撤离途中，李立三同志率领政治保卫处的同志们跟敌军的三个团遭遇，损失极为惨重。当清点队时，怎么也找不到李立三，因而同志们确信他已光荣地牺牲了。8月28日部队占领瑞金，不久，由周恩来同志主持，又一次为李立三同志开了追悼会。正当同志们在极为悲痛之中哀悼李立三时，他却高高兴兴地回来了。

1967年6月22日，李立三同志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迫害下，含冤自尽，结束了他坎坷的一生，终年只有68岁。

1980年，中共中央重新审查了李立三同志的问题，彻底推翻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在李立三身上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为李立三同志平反昭雪。3月20日由彭真同志主持，在北京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这是为李立三开的最后一次追悼会，也是一次慰藉李立三同志在天之灵的大会。

马克思的精神调节

马克思在工作间隙，常以各种方式的自娱来调节精神。

文学欣赏。马克思在孩提时代就特别喜欢听故事，常常“缠”着燕妮的父亲为自己讲美丽动听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神话传奇故事。后来在他伏案劳累时，便以阅读幽默小说、惊险小说和背诵诗歌取乐，求得精神调剂。

演算数学题。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感到劳困时以演算数学题作为休息，而且还以演算数学来驱逐悲痛。在爱妻燕妮病危以及病逝后他非常悲痛，全凭演算题来寻找安宁。这段时间内他还写了一篇关于微积分的论文。

与孩子在一起。马克思在工作之余，喜欢和自己的孩子做游戏取乐，他常和孩子一起玩“海战”。当纸折的舰在水盆中交战直至“敌舰”沉没时，他便与孩子们一起欢呼胜利。

聪明人的游戏。马克思的象棋玩得很出色，与李卜克内西玩象棋时，他常用“出其不意的进攻”来弥补自己棋艺的不足。他诙谐地称象棋是“聪明人的游戏”。

星期日郊游。马克思在英国伦敦居住期间，常在星期日携妻率子到北郊汉普斯泰特荒阜郊游。在那儿，他们随意聊天、打闹、赛跑、角斗、投石头、骑毛驴。马克思的骑术很糟，他常被摔下来，还讲幽默的趣话，将妻儿们逗得捧腹大笑。每次归途中，他总爱一边走，一边吟唱民歌跳黑人舞。

马克思的后裔

国际无产阶级导师卡尔·马克思有过七个子女、四个儿时夭折了，只有长女燕妮、次女劳拉和最小的女儿爱琳娜长大成人。

燕妮的肤色和性格都酷似父亲，最受马克思的宠爱。她28岁嫁给了新闻记者出身的巴黎公社流亡者沙尔·龙格，婚后以教书为业，先后生下五男一女，其中长子沙尔和三子昂利分别在幼年时病亡。1882年9月，她因患癌症于巴黎去世，年仅39岁。

劳拉是一位出色的翻译家，许多科学社会主义经典著作的法文译本，都出自她手。她在23岁时，与后来成为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的保尔·拉法格结为伉俪，共同生活了40多年，生过二男一女，但都夭折了。1911年11月25日，69岁的拉法格和66岁的劳拉双双自杀于巴黎郊外的寓所，原因是拉法格决定不使自己的生命逾越70岁，以免“成为自己和别人的累赘”。

爱琳娜28岁时与才华横溢的社会主义信徒爱德华·艾威林结婚。他们一生没有生育，与劳拉一起抚养着燕妮的遗子。十几年后，艾威林与一位女演员重婚，这使爱琳娜十分恼怒和痛苦，并直接导致她1889年3月21日吞服氢氰酸自尽于伦敦，时年43岁。

马克思的第二代后裔，共七男二女，但存活下来的只有长女燕妮的三子一女——让、埃德加尔、马赛尔和燕妮（与母亲同名）。

让在马克思身边度过了童年，19岁当选为集体主义大学生协会主席，23岁成为巴黎《社会主义运动》杂志社编辑，还当过律师和议员。1938年秋因车祸受伤并发血液中毒死于巴黎，终年62岁。

埃德加是法国共产党员，终身以行医为业，深受人们尊崇，他曾居住在纳粹占领区，但区内三万多名居民没有一个人告发他是马克思的外孙和共产党员。1950年12月，71岁的埃德加在出诊时猝然长逝。

马赛尔是个新闻记者，终年68岁。

燕妮70岁卒于巴黎。

马克思的曾孙辈有六男一女。让的长子罗贝尔，以律师和新闻记者为业，父亲死后，他一直是伦敦马克思墓的“看守人”；次子卡尔是个雕塑家。埃德加的长子沙尔，当推销员；次子弗雷德里克是个画家；三子保尔是马达加斯加种植园主，当过法兰西联邦议员；小女燕妮（与祖母同名），在33岁时死去。马赛尔之子沙尔也在45岁时死亡。

列宁为何能在十月革命前夕顺利归国

1917年3月（俄历2月），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沙皇被推翻，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掌握了政权。4月16日，列宁和其他19位革命者从流亡地瑞士乘火车，经德国、瑞典回到了首都彼得格勒。列宁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归国，与他灵活巧妙的斗争策略有关。

二月革命爆发后，流亡在瑞士的列宁迅即作出反应，想方设法地力求尽快回国。就当时而言，取道英国和法国已不可能，因为英、法政府不允许革命者通过。而冒用瑞典护照，经由瑞典入境的方法，也因列宁不会讲瑞典语而作罢。唯一可行的方案，就是设法经由德国回国。显然，从德国回国是困难的，因为德俄双方正在交战。但是列宁在经过深入细致的分析判断后，敏锐地预感到：德国为了其自身的战争利益，有可能会同意他和其他革命者经德境回国。当然，列宁非常清楚，取道德境回俄，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切敌人会借机诬蔑、诽谤他。但是为了革命事业，列宁毅然采取了这一方案。他在瑞士社会主义者普拉廷的协助下，向德国驻伯尔尼大使馆提出申请，要求经德境回俄。

德国大使罗门堡接到这个申请后，立即向柏林作了请示。柏林德国最高统帅部对列宁的申请作了全面的研究。他们认为，列宁是个激进的革命者和反战者。从他发表的革命言论来看，他回国后的目标就是要在国内发动武装起义，以暴力革命推翻临时政府，并使俄国退出协约联盟，停止与德国的战争。而德国最高统帅部已经感觉到，俄国临时政府并不打算放弃这一战争。可险恶的形势又迫使德国不得不尽早结束与俄国的战争，以便把东线的兵力调回来增援西线，从而由两线作战、左去右绌的困局中解脱出来。因此德国最高统帅部认为，尽管列宁回国后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可能会危及德国，但就目前而言，无论其革命成功与否，都将缓解德国在东线的压力，给德国以喘息的机会，德国可以抽调重兵增援西线，以便挽回颓势，赢得战争。基于这一考虑，德国最高统帅部决定同意列宁的申请，以抓住这个对俄国进行釜底抽薪、间接打击的好时机。然而德国最高统帅部万万没有想到，他们这条自鸣得意的计策，却早已在列宁的预料之中了。

4月9日，列宁和其他革命者顺利地登上了回俄的列车……11月7日，

列宁在彼得格勒领导和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

列宁曾被提名诺贝尔奖候选人

1917年，挪威社会民主党曾正式提议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列宁。该党在给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荐书中阐明的理由是：“列宁是迄今为止为和平思想的胜利尽力最多的人。他不仅不遗余力地宣传和平，而且采取实际步骤实现和平。”

挪威社会民主党的提名未被采纳的原因，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认为提议超过了规定的期限。

列宁很重视自己被提名这件事。1918年1月，列宁曾亲自接见挪威社会民主党著名活动家路德维克·迈耶尔。

列宁的一段著名论述与他的一次遇险

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中，有一段著名论述：“假定你坐的汽车被武装强盗拦住了。你把钱、身份证、手枪、汽车都交给他们，于是，你从强盗的光顾中脱险出来。这当然是一种妥协……但是很难找到一个没有发疯的人，会说这种妥协‘在原则上是不能容忍的’，或者说，实行这种妥协的人是强盗的同盟者……我们同德国帝国主义强盗的妥协，正是这样的妥协……应当善于分析每个妥协或每个变相的妥协的环境和具体条件。应当学习区分这样的两种人：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减少强盗所能加于的祸害，以便后来容易捕获和枪毙强盗；另一种人把钱和武器交给强盗，为的是要入伙分脏。”

列宁这段论述中的假定事实，与他一年前的一次亲身遇险经历颇为相似。

那是在1919年1月19日，这天是前苏联的传统节日枞树节，列宁和妹妹玛丽亚一起去看望正在索科尔尼克疗养的妻子克鲁普斯卡娅。

汽车从莫斯科驶出，距离目的地不远时，司机吉利突然从车灯光里看见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在挥手大叫“站住”，吉利以为是个酒鬼，便加快车速一冲而过。谁知，当汽车开进一个广场后，又有几名挥舞手枪的汉子窜出来喝令停车。此时，列宁同车上的人都明白了：这些人是土匪。怎么办？司机吉利想再踩油门冲过去，可是列宁却果断的下令停车。

3个土匪把枪口对准列宁的太阳穴搜走了他用以防身的勃朗宁手枪和克里姆林宫出入证，跳上列宁的汽车，开足马力朝远处驶去。

匪徒们离去后，列宁立即赶到附近的苏维埃政府，给国家肃反委员会打电话，命令迅速组织力量堵截抓获这伙土匪。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特维耶夫得知消息后，立即要了一辆汽车，赶到索科尔尼克。他见到闷闷不乐坐在楼下客厅里的警卫员，马上斥责道：“你是怎么搞的？……饭桶！”这时，列宁闻声走下楼来，对卫队长说：“不要责备警卫员同志，在当时的条件下是毫无办法。”列宁又说：“一般来说，在土匪占优势，当不得不选择最保留钱包还是保留性命时，只有十足的白痴才会选择钱包！”

几小时后，列宁接到报告说，抢劫他们汽车的匪徒是一伙漏网的惯匪，已被全部击毙。

列宁当演员

1918年底，列宁遇刺后，苏维埃共和国各地流传着“列宁已亡，中央政府群龙无首，并且已开始闹‘内讧’”的谣言，为了尽早击破这些流言蜚语，重新树立苏维埃的形象，打击哥萨克乌克兰白军的进攻，1919年5月初，刚刚伤愈不久的列宁决定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一次告全国同胞的演讲会。

与此同时，刚成立不久的“莫斯科人民电影制片厂”正在摄制一部反映当时苏维埃共和国红军进行军事训练的故事片——《九十六》，由于影片场景宏大，加上列宁的扮演者始终无合适人选，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影片几乎搁浅。正当编导急得团团转时，报上公布了列宁不久将去红场演说的消息。这时，编导灵机一动：何不让列宁亲自参加拍摄？使全体公民通过银幕都能目睹列宁演说的风采，这对辟谣和影片的历史价值岂不更有益？他们将这一想法经文化部转告了列宁本人。

列宁得到消息后，非常高兴。他风趣地说“电影事业是一种新兴的事物。我曾多次梦想有朝一日亲自参加拍摄，我就是想让人们看看我也是一位大明星。”为此，他还将自己喜爱的“桃”形胡子修理得整整齐齐，准备在实地拍摄时好好表演一番，演出自己的特色来。

演讲这天，列宁根据编导的设计和要求，很快进入了“角色”。摄影师拍下了他在红场上对群众演说、向游行致敬、倾听匈牙利共产党珀尔、夏杰尔演讲等许多真实感人的镜头，尽管列宁出现在银幕上不足半小时，但其表演技巧却引起全国性的轰动。当时各大报刊总的评价是：弗拉基米尔（列宁名）不仅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天才，全世界共产党的领袖，而且是一位难得的电影演员，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列宁自己塑造了“列宁形象”。

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给毛泽东

珍宝岛打起来后，前苏联人着急，担心事态扩大，上升为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因此就打电话来。那时候，中国共产党和克里姆林宫之间有热线联系了。据说，勃列日涅夫直接找毛泽东讲话。中共中央的话务员问：“你是谁呀？”

回答说：“我是勃列日涅夫，请接毛泽东同志讲话。”

中方话务员说：“修正主义分子！你是什么东西，能找我们伟大领袖讲话？！”

话务员骂了一通后，电话断了。

事后，中央机要局的负责人批评话务员：“你也没有经过领导，怎么能胆大包天，干这种事！”

风流未必年高

1921年，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毛泽东是28岁，最年轻的代表邓恩铭只有21岁。

1921、1923年，在党中央负责理论宣传工作的蔡和森、瞿秋白，分别是27岁和24岁。

1923年，27岁的彭湃在广东领导了海陆丰农民运动。

1924年，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才26岁。

1925年，27岁的刘少奇和26岁的李立三领导了著名的五卅运动。

31岁的邓中夏和40岁的苏兆征领导了著名的省港大罢工。

向警予任党中央妇女部负责人时，年龄也未过30岁。

1927年，29岁的周恩来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打响了第一枪。接着，34岁的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秋收暴动，28岁的张太雷领导了广州起义。

南昌起义后42岁的朱德和27岁的陈毅转战千里，率部到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红军会师。

领导赣东北阳横峰起义的方志敏是27岁。

领导湘鄂西武装起义的贺龙和周逸群是32岁。

领导平江起义的彭德怀和黄公略是30岁，滕代远是24岁。

领导百色起义的邓小平是25岁。

领导渭华起义的刘志丹是25岁。

1937年，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年龄刚过半百的朱德任八路军总指挥，38岁的彭德怀任副总指挥，40岁的叶剑英任参谋长，年仅31岁的左权任副参谋长，120师师长是41岁的贺龙，129师师长是45岁的刘伯承。新四军军长是大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铁军”领导人叶挺，时年41岁。

1945年，党召开七大和七届一中全会，选毛泽东为党中央主席，时年52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平均年龄是49岁多一点。经过三年多时间，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是年56岁。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朱德，分别是51和63岁。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的周恩来为52岁。

1956年，党召开了八大，成立了中央书记处，任党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51岁。

珍贵墨迹

1941年11月14日，是冯玉祥先生六十寿辰，我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叶剑英等同志均有函、电或亲笔书的贺词。值得高兴的是最近发现了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亲笔写的祝词真迹。周恩来同志的祝词为《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赞语中提到：“先生善练兵，至今谈兵的人多推崇先生，五原誓师后，又加以政治训练，西北军遂成为当时之雄。先生好读书，不仅泰山隐居时如此，即在治军作战之时，亦多手不释卷，在现在，更是好学不倦，永值得我们效法。丘八诗体，为先生所倡，兴会所至，嬉笑怒骂，都成文章……”

现在山东泰安市文物管理局正在选用泰山精刚石刻碑，竖立在冯先生在泰山住过的地方——普照寺。人们将在那里得以瞻仰周恩来同志手书的真迹。邓颖超同志亲笔写的贺词是：

“《冯先生六秩大庆》

写诗写文章，亦庄亦谐如口出；

反帝反封建，不挠不屈见襟期。”

1938年春上，邓大姐曾与冯先生会晤于武昌。谈话的内容有抢救战地受难儿童，筹募儿童保育院基金等，深得冯先生赞助。当时冯曾请周恩来同志派人给他和随他从战区下来的同志讲游击战等课题，周恩来同志派了凯丰、吴奚如等同志去讲统一战线和游击战，邓大姐还去讲妇女工作，叶剑英同志给冯的手枪营讲“持久战”，大家一起听课。

蒋介石自杀未遂揭秘

蒋介石的第三位夫人陈洁如，近年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件惊人轶事，这就是蒋介石在年富力强、飞黄腾达之际，曾企图举枪自杀，结束生命。

1927年，蒋介石在北伐途中，总司令部驻扎江西南昌。一天，蒋介石和陈洁如从庐山牯岭度假回来，突然接到来自汉口的一封急电。蒋阅后怒不可遏，满脸厌恶地把电报一丢，双拳击头，并将桌上花瓶掷得粉碎，然后猛然投入一张安乐椅中，低头伤心大哭！

陈洁如见状，连忙上前安慰蒋介石，细问之下方知真情。原来，武汉政府的党政要员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削了蒋介石的军权，欲将他一脚踢开。蒋介石愤恨不平地说：“他们抢走了我的领导地位，我的所有计划都完了！所有希望也破灭了！”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几天后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从武汉带来一封许崇智写给蒋介石的信。许崇智是蒋介石的老长官。他在信中指责蒋介石说：“自从我把整个部队交给你之后，党务混乱，并生分裂，政府则贪污腐败，你已成为众矢之的。”“你应为违背信仰而自责，并为维持国家和平计，谨守诺言。对你来说，是功成身退，对国家来说，是人民之福。”许崇智这封信无非是要蒋介石下台，以谢党国。与此同时，武汉政府的汪精卫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谴责蒋介石“把国家当做他的私人财产”，“大家应该武装起来反对并扫除此一叛逆！”武汉街头也出现了“若要革命成功，必先打倒蒋介石”的标语。蒋介石陷入四面楚歌，伤心绝望之时，即刻到处寻找他的手枪，想了此一生。幸亏陈洁如早有防范，在头一天已将手枪偷偷隐藏起来，蒋没有找到，才免于死。

蒋介石 1923 年在前苏联

1922年12月8日，孙中山给列宁去信：“不久的将来，我将派全权代表去莫斯科同您、您的同志讨论与我们两国利益有关的问题……”当孙中山成了广东革命政府和军事力量的首脑之后不久，就派蒋介石率领国民党代表团（也称军事代表团）去莫斯科。代表团于1923年8月启程，9月2日到达莫斯科，11月28日离开莫斯科回国。

蒋领导的代表团在前苏联期间会见了苏共（布）政治局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联共中央书记鲁祖塔克，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政治局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代表团访问了红军的一些部队、波罗的海舰队、飞机场、军事院校。代表团一些成员访问了工厂、电站，参观了莫斯科苏维埃为庆祝十月革命六周年而举行的群众大会，观看了军事检阅和群众游行。

1923年9月16日，蒋介石率团访问了莫斯科军区第144步兵团，参观了兵营、学习室、红角，和红军战士举行了座谈，并在红军食堂进行了午餐。

然后参加了专门为他们组织的群众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赞扬红军是世界上最英勇、最强大的部队。他说，他为能看到红军中一个优秀的团队而感到幸福。他号召红军战士埋葬资本主义。他接着说：“我们也准备同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作殊死的决战。我们到这里来是向你们学习并同你们联合。”蒋介石的讲话多次被掌声打断，军乐队齐奏国际歌。全场人员高唱国际歌，大家把蒋介石和代表团成员抬起来送到汽车里。

蒋介石访问这个团队时本想穿将军服，而且已经穿好，经前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代表劝说，为保密而以共青团代表团名义出现，改穿民服，实际上代表团中只有一名共青团员：张太雷。

当时中国国内实行国共合作政策。1923年11月2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举行会议讨论东方革命和中国革命问题，请蒋介石在会上报告国民党的活动情况。蒋介石说“国民党是世界革命的一支力量”，国民党的革命活动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他说国民党有60万党员，其中三分之一是工人、农民。他把国民党的力量夸大了。那时中国共产党只有420名党员。

蒋在报告中还说：“共产国际代表了世界无产阶级利益，领导世界革命运动。共产国际应特别关怀中国革命。”他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他对中国革命充满了信心，认为只需三五年完成民族革命，然后宣传共产主义。他代表国民党建议在这两个国家革命胜利之后建立“三强同盟”，并说“依靠这一同盟，我们将很容易地完成世界革命，消灭世界资本主义制度”。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了蒋介石的报告后，于11月28日通过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的决议》，《决议》要求全力支持国民党。

托洛茨基是在1923年11月27日，即蒋介石回国前一天接见蒋介石的。他首先表示“见到前苏联的朋友孙逸仙的代表很高兴”。蒋请他对国民党的工作提意见。他要国民党重视宣传工作，他要国民党从敌人中找到支持者。

蒋介石向托洛茨基提出一个计划，即国民党从南方向北方军阀进军，前苏联军队经过蒙古向北方军阀进攻，双方夹击。托洛茨基说，根据当时形势，前苏联不能直接出兵支援中国革命，但可以帮助训练中国军事人才。蒋在向托告别时说：“国民党一定努力贯彻俄国同志的意见。”

蒋介石在前苏联逗留期间表现出明显的矛盾。同前苏联人会见时高度赞扬苏维埃制度、红军、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在代表团内部他对前苏联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表示不满，对于前苏联没有接受他的计划，十分生气。

蒋介石回国之后，还说了许多中伤前苏联的话，但是未能影响孙中山联合前苏联的决心，蒋也不得不暂时适应这一情况。直至孙中山逝世后，蒋于1925年掌握了最高军权，并终于在1927年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完全走上了背叛革命的道路。

蒋介石险些被活捉

蒋介石逃离大陆前，差一点被活捉。组织和指挥这一行动的是国民党中将军张权。

张权是北伐时期师长，抗日时期任战车防御炮队总队长，下辖八个师。他为人正直，反对内战，曾当面规劝过蒋介石。他的秘书叫王亚文（即沙文汉，解放后任浙江省长）。在王的联系下他曾以国民党“视察员”身分，到江阴要塞“视察”，弄清了要塞区所有炮位数量、位置等，为我军顺利渡江

立下功勋。也是在王的联系下，张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配合解放军，迎接解放。

1949年4月底，蒋介石从杭州赶到上海，当时国民党驻沪部队25万人，不少将领，包括淞沪警备司令汤恩伯都曾是张的部下。蒋介石到上海前后，张权就单线联系了一艘兵舰，准备沉在吴淞口，封住蒋在海上退路。同时张计划自己率精兵一部，强攻北四川路警备司令部，配合解放军，活捉在复兴岛上指挥作战的蒋介石。非常令人痛惜，这一计划，被坏蛋张贤出卖。

1948年，张贤失业在家。李延年兵团暂编一纵队司令李锡佑进驻上海后，李任命张为中校参谋长。李锡佑参加起义行列后，5月13日，张贤有事去李家，李就给他布置了起义任务。第二天下午，张向132师师长告了密，并在15日清晨，带着便衣特务，抓走了李锡佑。下午在张权从吴淞口返上海市区途中，特务又把他抓住。

蒋介石听说张权要活捉他，气得把玻璃杯摔在地上，并下令以“银元贩子”名义，“扰乱金融”罪名，在南京路西藏路闹市口把张和李处决。张贤从中校科长提为上校处长，并领到银圆5000元的赏金。他在大陆潜匿下来，1957年9月26日，上海人民法院将他判处死刑。

蒋介石曾想软禁毛泽东

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在与毛泽东进行了几次交手之后，自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怕谈判结束后“放虎归山”。于是又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软禁毛泽东，但又怕此举失信于天下。正在举棋不定之际，他接到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和冯玉祥将军等人分别打来的电话。于、冯等人说：蒋先生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九州尽知其诚，然现在外界竟有微词，谓先生有软禁毛泽东之意。这种传闻于和谈有碍。为正视听，余等准备通过报界予以辟谣，澄清事实。蒋介石听着十分恼火，但又不便发作，只得故作镇静地说：“明人不做暗事，谣言不攻自破。请二位先生及其他党国要员不必介意道听途说。”

后来，蒋介石迫于各方面的压力，又考虑到全面内战的准备工作尚未做好，伪装还不宜过早地撕破，只得打消了软禁毛的念头。

蒋介石企图暗杀李宗仁内幕

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政权摇摇欲坠，其主子美国政府对他也已丧失信心，想舍蒋而取李，让李宗仁出来组织新政府。对此，蒋介石很是恼火，决心除掉李宗仁，使美国人死了这条心。

1948年11月，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从南京发电昆明，召回云南站站长沈醉。沈醉一下车，便被送到玄武门至傅厚岗那条路上的“诚庐”。这个“诚庐”是保密局特务头子开会的地方。当天下午，毛人凤来到“诚庐”，宣布由沈醉主持刺李行动，并强调这是蒋介石的意思。然后，毛、沈同去见了蒋介石。蒋接见他们时，态度非常和蔼，对沈醉极表关怀，然后关照沈迅速布置好工作。最后，他还作了一些不伦不类的比拟，如荆轲刺秦王等。临别时，蒋握着沈的手对毛说：“这是我们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在工作中和生活中如有困难，你要全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沈、毛等人商量组织了“特别行动组”。工作分两部分进行：一是实施暗杀；二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当时，李的住所在傅厚岗后面，沈醉等人到那里进行了观察。根据李的汽车在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这一有利条件，他们决定采取从马路两边同时打枪的方案。毛人凤还挑选了秦景川、王汉民两个神枪手协助沈醉，以确保成功，为了便于侦察和行动，他们在李宅附近设了一个旧书摊。为了防止李突然离开南京，他们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开了一片杂货店作为据点，如发现李到机场，即报告毛人凤通知空军派战斗机追击。为了防止火车逃走，又在江南铁路车站附近买了一间小木房。摆了个香烟摊，进行监视。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也派两个人去开了一家小饭馆，负责监视。这样，可以说李宗仁是难逃厄运了。

到了1949年1月中旬，毛人凤几乎每天都叮嘱沈醉做好准备，等蒋介石一声令下就立刻动手。沈醉等人每人都带着两支手枪，弹头内已注入剧毒药剂，那个旧书摊也准备好了一挺手提机枪和几个炸弹，作为加强行动之用。毛人凤担心李宗仁闭门不出，又下令在李宅周围做好准备，一旦接到命令，即使李不出来，也可以马上行动。

然而到了1月20日，形势发生了变化。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决定自己“引退”而让李宗仁出来任代理总统，便叫毛人凤向沈醉传达命令，立即结束“特别行动组”的工作。

蒋介石的发妻

蒋介石的发妻、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的名字，在海内外出版的诸多书籍、报刊中较为混乱：除“毛福梅”外，也有写作“毛福美”、“毛馥梅”的；在有些书刊中，“福梅”与“福美”同时并存（如吉林出版的《蒋介石生平》）。为此，有人在奉化调查了毛福梅的娘家亲属和友好，弄清了情况。

毛福梅出生在浙江奉化县溪口镇岩头村。其父叫毛鼎和，育有4个子女，依次取名为英梅（女）、怡卿、懋卿、福梅（女）。儿子都带“卿”字，女儿都带“梅”字。

毛鼎和是个乡间文人，给子女取名也颇讲风雅。他开始时给毛福梅取名为“馥梅”，但由于山村文化水平普遍较低，“馥”字难认、难忘、难写，使用不便，待馥梅稍长，乃改名“福梅”。后来在流传中，因为读音接近，有人把“梅”误成了“美”。

毛福梅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叫从青。1903年，蒋介石到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读书，把毛福梅带在身边，让她进了当时奉化唯一的女校——作新女校。校长王慕兰女士善诗文，是奉化著名的闺阁诗人。该校学生大多在10岁左右，学小学课程。为开启女子读书的新风，王慕兰破格吸收了20岁出头的毛福梅入学读书，还特地为她取了个学名“从青”，意思是鼓励她从头学起，青出于蓝。

蒋介石和他的老师毛思诚

毛思诚原名裕称，字勉庐，奉化溪口人。清代末叶，执教于府治崇正学校。当时的校长为戴季石。两人都好酒，课余据案对酌，饮尽五壶后，或赋诗，或弈棋，直至午夜始罢，两年后戴氏卸职，毛思诚也同时离校。不久回

乡，在本村东头开设学馆，招收远近十多个学生，少年蒋介石便是其中之

蒋介石任黄埔军校校长时，毛思诚是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师。蒋驰书召毛入粤，委以秘书职。蒋带领黄埔师生取得东江战役第一次胜利后，又委任毛思诚为潮阳县县长，然而毛自觉是个文人，上任只3个月，就上书蒋介石：“吾性好酒，而才非庞士元，百里侯非吾愿也。”蒋读后大笑，应允毛辞职。北伐以后，国民党政府定都南京，毛思诚被任总司令部文书科长，并被选为监察委员，寓居南京富明坊。常到秦淮河边的酒肆买酒，当地无人不知有“富明坊毛先生”。毛平易慈和，毫无官场习气，喜奖掖后进。西安事变后，毛辞职回乡，于1939年病逝。

毛思诚除了著有《国父教科书》、《蒋介石大事年鉴》两本书外，还编著了另外两部书，一为蒋介石《自反录》，计6大册，集蒋介石文牍书翰之大成，书名亦由蒋亲署；二为《民国十五年以前的蒋介石先生》，共20厚册。两书都属非卖品。后者据蒋介石亲笔日记，以编年体纂集而成，毛思诚为它花了很多心血，曾三易其稿，并经于右任、吴稚晖、陈布雷等审阅参订。1938年，孔祥熙去了英国贺英王加冕时，曾携之以赠世界各大图书馆。同年夏，国内各大学也无偿地得到了它。

蒋介石从军记

蒋介石与毛福梅结婚后的几年中，他先是考进了奉化城里的新式教育先驱——凤麓学堂，继而又转入率先改革学制的龙津学堂。其间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不久，日俄爆发战争，中国国土成为强盗厮杀的战场。蒋介石痛于国力柔弱，决心弃文从武，到日本去学军事。蒋介石毅然剪去辫子，让毛福梅带回溪口老家交给母亲，以明投笔从戎的心迹。然后，匆匆地踏上了东渡扶桑的路程。蒋介石到东京以后，因为不是官费留学，入不了军事学堂，只得悻悻而返。但他受挫气不馁，决心在国内取得官费留洋的资格。不久，他便以蒋志清的名字考取了浙江武备学堂。

对于儿子的选择，蒋母竭力反对。这几年，她备受生活的熬煎，一心希望蒋介石能继承父业，走振家业保富贵的路子。谁料，儿子偏偏不遂母意。再说家境窘迫，也拿不出更多的钱供养蒋介石的开销。正当蒋介石寻思无计的时候，寡言少语的毛福梅出乎丈夫意料地将自己的陪嫁——一只珍贵首饰箱捧到丈夫的眼前。蒋介石揣着妻子的首饰箱，踏上了去杭州的路程。路过宁波时，他去了森顺木行，找到舅父孙琴凤，要他帮忙变卖首饰。

孙琴凤对外甥的志向十分赞赏。他看到蒋介石像端宝贝似的把首饰箱子放到自己面前，便摇头晃脑地说起来：“现在是，万般皆下品，唯有从军高，你老婆比你阿姆看得开。单是这一片诚心，我做娘舅的也不能袖手旁观。这样吧，盘缠铜钿就算我的，首饰箱嘛，还是送还你老婆。”蒋闻言大喜，从孙琴凤手里接过100块大洋，千恩万谢地告辞而去。

蒋介石阅兵遇险

1926年8月上旬，国民革命军北伐各军连克湖南首府长沙等城，全国各地军阀对北伐军开始刮目相看。8月14日，蒋介石为显示总司令对非嫡系部队的关怀，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检阅了将在次日担任主攻任务的第七、第

八军。

是日，受阅的第七、第八军排成横列，显得军容雄壮。蒋乘一匹高大枣红马缓缓进入主帅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受阅人数。随后，阅兵开始，蒋介石由十余名将领分乘战马陪同，自右向左，先检阅第七军，顺利通过。可到检阅第八军时，该军别出心裁，忽然乐声大作，号兵突然鸣号，声音刺耳。蒋的枣红坐骑受此一惊，长嘶一声，前蹄腾空，向大校场中心狂奔而去。蒋骑马乏术，瞬间跌落下来，但右脚却卡套在蹬上，整个身体拖在地下，极其危险。顷刻间众将官纷纷下马，准备围堵烈马。这时只见蒋已挣脱马蹬脱离险境，大家蜂拥将蒋扶起。校场顿失威仪，阅兵遂毕。

蒋介石剃光头始于何时

人们从电影和电视中看，蒋介石的造型大都是光头形象。那末，蒋介石剃光头是从何时开始的呢？

蒋介石年轻时头发是茂密的，一直蓄“分头”。1934年2月，他在南昌督战“围剿”红军时，提出了所谓开展“新生活运动”的主张，并亲自担任新生活运动总会会长。他主张实行“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在“国统区”强制推行所谓的“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47岁的蒋，带头剃了光头，以示新生活、军事化、艺术化和反共决心。从此以后，蒋介石就以光头的形象出现了。

蒋介石为何不常在“总统府”办公

提起南京的“总统府”，人们总以为它是蒋介石当年办公的地方。可实际上，“总统府”内的蒋介石办公室几乎形同虚设，蒋介石是在那里接受外国驻华使节呈递国书，或召集公开会议，或接待外国人，或偶尔处理一些公务。他的主要办公地点是在其官邸——原黄埔路东面的中央军校内。

蒋介石选择军校作为自己的官邸和主要办公处，是有其原因的。

1925年，蒋介石在广州任黄埔军校校长。秋季的一天，他从广州北教场军校“入伍生总队部”乘坐一辆小轿车返回城内军校。不巧，汽车在途中发生了故障，他便离开这辆插着国民党旗的车子，换乘了另一辆没有插旗的车子。不料那辆插着旗子的车子在东坡楼附近遭到伏击，车上两人被打死。事后才知，此乃第四军杨金龙旅所为。蒋介石又气又恼，立即下令严办。谁知东坡楼事件没过几天，蒋的卫士又捉住两个企图行刺蒋的刺客。蒋介石心惊之余，便下令严加防范，并提出了设两处办公室的做法。到南京后，蒋介石把另一处办公地点设在官邸。他本人是军人出身，又曾任黄埔军校校长，所以对军校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况且，把官邸设在军校内，周围的师生便形成一层无形的警卫网，安全可靠，行动方便。所以，他主要是在官邸办公。

南京中央军校内的蒋介石官邸，是一幢红色两层楼小洋房，楼下是客厅，楼上是卧室。蒋介石便在此办公，经常召集有关人员开会、训话。

蒋介石夫妇的南京汤山别墅

“金陵新四十景”之一的汤山温泉，位于南京东郊宁杭公路旁的汤山镇。

相传早在 1500 多年前的南北朝时代，南朝的梁太后就曾在这里洗浴，治愈了皮肤病。唐代著名画家韩混混的女儿患“恶癖”，四处求医无效，到汤山沐浴后也治好了，汤山温泉因此而名闻遐迩，天下名士过此，无不沐浴“神水”，以求长生。

民国年间一些国民党元老竞相在汤山建造私人温泉别墅，其中有大律师陶保兴陶庐、张静江公馆、戴季陶公馆等。而蒋介石夫妇在这里设立的秘密别墅却鲜为人知。

其实，这幢“蒋氏别墅”原属国民党元老张静江所有。当时，汤山温泉的 6 处泉穴得已被国民党元老占据，蒋介石虽身居要职，但与他们相比属于晚辈，故而不好强占戴季陶和张静江的地盘，只好在张静江公馆北面约 100 米处建造了一个“国民党军人俱乐部”，引用陶庐的泉穴之水洗澡。俱乐部内设餐厅、先澡间和休息室。蒋介石委派自己的贴身副官胡昌在此专门负责安排食宿。为掩人耳目，宋美龄还出资办了汤山美龄小学（现为汤山中心小学）。有一次，蒋介石头戴礼帽，身穿黑色长袍，外套锦缎马褂的黑披风，在蒋经国和蒋纬国的搀扶下，与宋美龄一道视察美龄小学时，被当地老百姓认了出来。此后，人们才知道这“国民党军人俱乐部”实为蒋介石夫妇的秘密温泉别墅。

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其宪兵队驻扎在张静江公馆，拆毁了蒋的“俱乐部”。1945 年 8 月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便派兵接管了张静江公馆，据为己有。此年底，又投巨资进行翻建，扩大了庭院面积，装修了内部设施。

建后的“蒋氏别墅”整个庭院占地约五六亩。主建筑是坐北朝南一字排开的五间平房，屋面换上了赭红色的琉璃瓦。围墙由青石砌成。内部设施豪华奢侈。蒋宋的温泉“鸳鸯池”设在地下室内。池旁有一面落地式大玻璃镜，其后面是一个秘密地下通道，与别墅后面的警卫部队驻地相接。“鸳鸯池”里间还有两个白搪瓷浴缸，右为蒋的清水缸，左为宋的牛奶缸。蒋总是先到鸳鸯池洗温泉浴然后到清水缸浸泡；而宋则先用牛奶沐浴，再到鸳鸯池洗温泉浴。

1948 年元旦，蒋氏夫妇又来汤山，正值蒋军在三大战役中节节溃败之时。美龄小学校长唐其久因故接驾来迟，当即被心情烦躁的蒋介石撤了职。据说此后直到逃离大陆，蒋氏夫妇再也未来汤山。

蒋介石在台湾 47 处行宫揭秘

阳明山昔称草山，自日据时期迄今，一直是王公巨贾幽居避暑之地。

台湾阳明山公园一带，有一些“身份”特殊的府邸，长久以来为公园景色增添一层神秘的尊贵氛围。这些府邸的外观，或因主人权高位重而保有光鲜门面，或因人去楼空而徒留遗世沧凉的陈腐破败。在众多的府邸中，要先从蒋介石的老官邸说起。

蒋介石老官邸：湖底路一四九号，占地三百多坪。花木扶疏，蒋介石故世后，传闻绘影形声。

蒋介石这座官邸位于阳明山源底路 149 号，外观上看不到门牌，不过也并非难以辨认，从阳明山公园正门前一间小杂货店，循着一条下坡的巷道，直走到有岔路出现，转向右侧一条林木夹道的小径，便可看见一座砖木合造的房屋，屋前石砖砌造的哥德式拱门是最好的辨认标记。

占地 300 万坪的老官邸，在财产登记上属台北市政府路灯管理处所有。1988 年中，多位台北市议员在大会期间，曾要求公园加予整修，并提供开放使用。

老蒋行宫四十七处。

蒋介石生前的行馆有 47 座之多，遍及全岛各地，除一、两处为蒋经国同意开放，大部分行馆都尘封已久，日渐老旧。

其中有的行馆，蒋介石生前并未进驻，但却保留下来，也有的行馆虽已入为纪念馆，但每年只开放一天，毫无经济效益可言，并且也造成人事、维修费用上的浪费。

最早当老官邸还是叫作“福大招待所”的时候，经常是达旦通宵的狂欢作乐，后来日本人恣性狎玩结果闹出人命，死了一个欢场中的女子，加上招待所里担任伙夫的台籍同胞，绘形绘影地述说一些“异象”，自此以后“福大闹鬼”，便在居民间传开。胆怯点的妇孺就算是在大白天也不敢到招待所踮踏，台湾光复后，日本人走了，“福大招待所”仍是人烟罕至，愈发显得阴森。

别墅群中，“福大”环境清幽，溽暑时仍凉爽宜人，这点为蒋介石看中，便向当时财产登记所有者台糖公司“租赁”而居，一直到 1975 年蒋介石去世后，官邸才又逐渐荒凉。

在蒋介石居住的期间，“鬼话”之说渐渐冷却。

现在这座老官邸内虽已空空荡荡，但房间格局仍保留“福大招待所”时的格式，未曾有过太大的更动，从拱门走进，先是一间长形的接待室，也就是“福大”的衣帽间和收发室，再进得里面才是府邸的正室，一个大的会议大厅。厅堂悬挂的大多是蒋介石生前点阅三军的放大照片，还有蒋夫人来美龄手绘的国画作品，如今只剩得四壁皆净。

屋宅内的门特别多，当时这些门都有侍卫和军犬守卫，顺着木质地板的通道驱进，可看到一个天井的小花圃，花圃内种植几株高大的桂花树及一些棕竹、海棠和西洋凤仙花。

花圃左侧是起居室和小客厅，通用一条狭长的阳台，阳台除了纳凉小憩外，兼可防范山里骤风斜雨溅入屋内。不过现在的阳台停摆几张原本在大厅使用的长桌，破旧腐朽的样子实在很难叫人联想起当年气度恢宏的派头。

侍卫休息室的对门是蒋夫人宋美龄的卧房，和紧临的蒋介石卧房相通，格局大致相仿，天花板上各钉有可以悬挂蚊帐的线圈，落地门窗采光良好，只是夫人卧房的面积要大些，加上旁边一间简朴的浴室，可说是官邸内唯一的套房。

书房是老官邸最内侧的房间，现仍保存部分家具，有一张靠在书桌旁的卧铺，缎面躺椅，据说已有 50 年历史，与放在侍卫室里的几张椅子成套都是当初从大陆迁运往台的。

蒋介石生前喜爱干净，东西陈旧无妨，但一定得清洁卫生。居住在官邸的日子时，蒋介石有晨起散步的习惯，从官邸出发，信步走上阳明山公园，结果常常是一大清早，侍从们提前出门沿路搜索果皮纸屑或野狗粪便，这些都要一一清理，以免让蒋介石瞧见。

就有那么一次，蒋介石没按先前习惯的道路走，绕一个弯道，不巧让他看见路旁一堆狗粪，皱着眉头问身旁的一位负责管理阳明山公园的任姓主管这里怎么会有这样的东西呢？侍从们随即赶忙清理，可是从那天起这位任先

生却因这次“狗屎”事件受责，结果没过多久便害起病来，病情与他的心情一样一直没有好转，这位与蒋介石同是浙江省籍的老同志，最后便因此郁郁而终。

公园内有几处是蒋介石生前经常歇脚的地方，象喷水池附近原本有一座木造凉亭，公园拓建时即已拆除，还有光复楼原先也是蒋介石生前常去休憩的旧址，直到1971年才修建成现在的样貌。此外山头的“阳明书屋”也是常去巡视的地方。如今园内尚保有旧观的仅存“后山宾馆”一处。

据说那时候，象张群、陈诚、张道藩这些台湾党政要人也常常在此陪蒋介石进餐。

辛亥光复楼：位于公园入口处，早年是蒋介石与夫人游园歇脚处，蒋经国也经常来此作家族聚会。

位于阳明山公园入口处不远的辛亥光复楼，宫型外廓，气度恢宏，是园中唯一的两层楼房，也是最为明显突出的建筑物，楼下现已全面开放，为公园餐厅，专供游人歇息进餐之用！高挂“闲人勿入”的二楼则有两种用途，中间大厅是公园管理处向游园贵宾作资料简报、播放影带、幻灯片的地方，在其两侧东西各有一间终日深锁的“贵宾休息室”，若无重要访客到这里，是绝不对外开放的。

这两间厅房是1971年左右专为蒋介石及其夫人游园休憩用餐而辟，但由于1971年之后，蒋介石的身体健康状况已经不大好，来过的次数并不多，倒是当时在“行政院长”任内的蒋经国常来。

两间贵宾室一般大小、格局相仿，同为前厅后室，占地约莫20坪，厅中除8人落座的圆形餐桌外，就是一套老式的长形客椅，上覆素白座垫，仅有的装璜约6尺的宽幅居画《飞鸟投林》图，为国画大师欧豪年所进献。

内间休息室有一对分别雕凰、刻雀为床头饰的单人小床，一座一人多高木制衣柜及漆彩斑驳的梳妆台靠墙而立，剩余的空间大得冷清。

自蒋介石辞世、蒋夫人赴美之后，这儿曾经一度成为蒋氏家族假日聚会的场所，蒋经国及蒋纬国常偕同家人或要员在此用餐会商。

后山宾馆：原名“山本别墅”，蒋介石生前很少在此过夜。

在辛亥光复楼右侧小径，一面“游客止步”标上牌后的围墙内，拾阶而上，抬眼所见一幢纯正日式庭园瓦房，就是阳明公园“后山宾馆”所在，原名是几被遗忘的“山本别墅”。它原是日据时代日本富商山本义雄在台湾的私人产业之一，台湾光复之后产权归划台北市政府所有。阳明山公园现在的规模，即是以山本别墅为起点，逐步扩建而成。

狭长的屋形由北向南一字排开，主、客卧房共4间，依序毗邻而列，饭厅居中、大厅在侧，格局宽敞大方，后间浴室设计颇具创意，从中平剖成半圆分成男女两间浴室，并装设了硫磺活泉，终年涌流不断，其特殊气味亦弥漫全室，这大概是蒋介石甚少在此过夜的主要原因。不过，台湾市府一级官员们，如前台北市秘书长马镇方等，还是喜趁闲暇来此休息、洗硫磺澡。

阳明书院：蒋介石生前最后兴建的别墅，目前隶属国民党党史会，最为神秘。

从阳明山公园往山顶瞭望，在竹子湖侧候所旁边，可以隐约瞥见一座巨长的平台水泥建筑，深沉的外观与山峦几乎同色，苦队雾中望去，会误以为是另一座山头孤岭，而不经意地遗漏掉。

这幢蛰伏在山峰棱线上的神秘建筑物，就是落成于1973年的“阳明书

屋”，是蒋介石生前所拥有最晚建成的别墅，蒋介石逝世后这幢深色大宅依然戒备森严，门口挂着一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的牌子，显示它已别有用途，由于座落在军事管制区的范围之内，而且位置居高而隐秘。可见当时设计建筑时其主要作用绝对不仅止于供人休息或住家的单纯作用，一般民众不但无法靠近观看，就连上山入口都不得其门而进。

环眺四面，群山高低萦绕，“阳明书屋”可说是目光所极处最高的建筑物，平台构造却丝毫不显凸出，地处险要而诡异，其军事地位必相当重要，军事作用也必大于所有。

蒋孝武三兄弟别墅：中正路五号六号，占地二千坪，警卫森严，终日人迹罕见。

从中山楼左转，一条弯度极大的马路就是阳明山中正路，中正路五号、六号是两幢终年铁门深锁的别墅，占地各千坪左右，分别由蒋孝武、蒋孝勇兄弟使用。

日据时代是台北水道所（相当现在的自来水事业处），目前产权不详，有人说是台湾省政府财产，又有人说是属于自来水事业处，却始终未见有关单位出面说明。

五号是蒋孝武的别墅所在，目前由于蒋孝武任驻新加坡商务正代表，一年难得回来一次，所以别墅中只剩管理员。数年前，蒋孝武以职“中国广播公司”期间，有人送他的10对梅花鹿，就一直养在这间别墅内。

比邻而居的六号别墅是蒋孝勇所在，而蒋孝勇在台北市内却另有寓所，虽偶尔会上山停留，但次数不多。外传蒋孝武、蒋孝勇两兄弟向来不和。种种流言亦在此绘形绘影地传播多时，其真相究竟如何，如同这两幢莫测高深的庭院别墅。高耸的围墙且外加铁丝网，钩钩带带刺刺得令人费疑猜。

另外四周共有两上明哨和两个便衣哨，轮番把守，交叉巡逻，不准拍照、不准绘图，如军事重地一般。以卫兵日班4小时，共8人，夜班2小时，共16人，合计起来，阳明山宪兵队每天要派24个宪兵来保护10对梅花鹿及两个管理员。

至于蒋家大公子蒋孝文的寓所，和两个弟弟就离得远了，在电力公司明山分处左侧不远的小山丘上，详细路名是中山路，在通往山坡的车道旁就设有两个便衣哨监视把守，外人很难明白别墅内的情形。和蒋孝勇、蒋孝武相较，蒋孝文更显“传奇”，因为令人连门都摸不着！

刺杀蒋经国案揭秘

当年参与刺杀蒋经国的台独联盟成员郑白才，最近在台湾公开露面，使曾经轰动一时的“刺蒋案”再度成为人们谈论的话题。台一杂志对这次刺杀行动作了披露。

历史刚跨进20世纪70年代，被台湾视为最忠实盟友和靠山的美国，在外交上有明显的异动趋向，尼克松政府频频向北京示好。甫任台北“行政院”副院长的蒋经国奉父命访美。

台独联盟认为这是个天赐良机，要行刺蒋经国，借此扩大台独的影响。

1970年4月24日早晨，蒋经国邀台北各报驻美记者同进早餐，餐点是寿桃寿糕，藉以庆祝他60岁生日，寿宴上宾主尽欢，没人料到一场危机即将来临。

中午，蒋经国前往布拉萨酒店参加一个宴会。蒋的车子一抵门口，蒋即由两名安全官员左右护驾，纽约两名便衣警探亦紧随在后。蒋经国走上台阶正要进入正门之际，手持枪械的台独联盟成员黄文雄从正门两侧的大理石石柱后迅速闪出，冲过警卫群，欲举枪射击，跟在蒋经国后的便衣警探亨利·苏尼兹将黄文雄拉住，并立即向另一便衣喊道：“注意，这人手上有枪！”这时，蒋经国惊惶失措，躲进扇形转门内，黄极力挣脱并开了一枪，子弹打在正在转动的玻璃门上，黄欲冲进酒店，但终被制服。这时郑白才冲入人群要救出黄文雄，被警卫用警棍击中头部，也被制服。刺蒋失败后，黄郑两人分头逃亡，黄文雄下落不明，郑白才后被引渡回美国判刑，出狱后移居加拿大。

最近，郑白才通过秘密渠道返回台湾，台国民党当局如何处置这名刺蒋主犯，正受到各方面的关注。

蒋家三代死亡秘闻

蒋介石死前三年已部失夫去处理公事能力

从 1972 年起，蒋介石名义上是总统，实际上已部分失去处理公事的能力，党政军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蒋经国处理再向他报告。当时，在蒋介石身边共有 12 位医生，一天 24 小时都有医生值班。

1975 年 4 月 4 日，“御医”姜必宁和另一个医生值半夜 4 点至第二天早上 8 点的班，住在楼上。当晚 9 点多钟，值班医生发现 88 岁的蒋介石心脏停止跳动了，马上把姜必宁叫去做心脏按摩、打强心针等急救工作，急救了一个多小时，毫无效果。姜必宁报告宋美龄说，可能没有太多希望了。宋美龄还是要求他们再试一试，他们只好再抢救一番。其实，人早就死去了。

蒋经国大量吐血过世，外界质疑不断

蒋经国 1978 年上台后，姜必宁成为蒋经国医疗小组的负责人。前四年，蒋经国身体很好。后来视网膜脱落，眼睛动手术不太理想，左眼视力很差，只靠右眼看东西。1985 年以后，一年不如一年。

1988 年元月 13 日，早上起来，蒋经国说他肚子不舒服。姜必宁给他吃胃药，他还是感到不舒服。问他怎么不舒服，他也讲不出怎么个不舒服法。他说：“我们要不要去住院！”姜必宁说：“好啊！如果真的不舒服就考虑去住院，我叫车队准备……”话未讲完，蒋经国哗一下吐血了，接着第二口血又吐出来，没过两分钟，就死去了。

由于事先没有公开蒋经国的病况，这次胃肠大量出血造成突然过世，自然引起社会的质疑。姜必宁成了“众矢之的”。姜必宁受命不要对外多言，他只好“含冤莫辩”了。蒋经国的过世，几乎使姜必宁声名败坏。

蒋孝武死亡内幕现在还不能讲

蒋孝武在荣民总医院也是死得突然，当时社会议论纷纷，至今许多人也还弄不清是怎么回事。

对于蒋孝武的死，姜必宁说：现在还不能讲，等我老的时候，可以写回忆录，也许可以透露一点不寻常的消息。他认为，荣民总医院没有过失，要怪就怪蒋孝武自己。蒋不是自杀，他不想死，也不是医院弄错药方。他的死亡是一个不幸，而这个不幸，含有几分他自己的成分，但也不能讲完全是他的问题。因为，蒋孝武还有另外的毛病，常常需要一些特殊的药物，他以前得过胰脏炎，病起来很受不了，需要特殊的药品，这些药可能跟那天晚上有

相当的关系。

从姜必宁欲言又止的态度看出，蒋氏家族至今仍然保留有几分神秘的忌讳。

孙中山赠张学良的横幅

张学良的90大寿，1990年6月1日在台北圆山饭店举行。在庆寿活动中，张学良收到一份珍贵的礼物——60多年前，孙中山先生题赠张学良的一幅横幅，上写“天下为公”四字，上款是“汉卿世兄属”。此件墨宝原物现藏沈阳博物馆。任职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王冀教授，这次来台北时特地携回北京荣宝斋水印复制品，献给了张学良，张学良一再向在场的故旧、门生、东北同乡表示感谢，并发表约5分钟的生日感言。他说：“我老了，但还未聋；眼力不好，但也还看得到。”他说，为国家、民族，如果还需要他，他一定会秉持如年轻时的情怀，全心效力贡献自己。

周恩来三哭张学良民

在周恩来与张学良各自的人生旅程中，彼此交往的时间虽然短暂，然而，为一个共同的抗日目标，他们之间却建立了异常感人的深厚情谊。1936年4月9日，周恩来策马扬鞭，冒雪赶到延安天主教堂，与张学良作彻夜长谈。两人肝胆相照，开诚相见，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双方都大有相见恨晚之感。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应张、杨两将军邀请，赶到西安共商大计。1936年12月25日16时许，周恩来正在开会时，张学良突然秘密陪送蒋介石飞离西安。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到现场，但为时已晚。周恩来眼看着直上长空的载着张学良和蒋介石的飞机越飞越远，眼里含满泪水，反复地说：“张副司令，张副司令……”飞机早已看不见了，但他还久久地仁立在那里。1946年4月28日，周恩来在重庆曾家岩50号举行的与重庆文界人士话别茶会上，报告了东北谈判的经过。他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这时，曾与张学良有很深历史关系的东北人士王卓然对周的感慨致了一番安慰，他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这番话引得大家欲哭不能，心中十分难过，周恩来的双眼立时闪出一丝悲凉的泪光。1961年12月12日晚，在北京饭店一楼大厅举行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的招待会。席间，周恩来首先讲话，回顾西安事变的功绩，对张、杨两位爱国将领表达了深切的怀念之情。这时，张学良的四弟、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参谋长张学思将军异常激动，感情不能自抑，他在给周恩来敬酒时泣不成声，顿然使整个会场气氛十分沉重。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

蒋介石赠鱼竿气煞张学良

1939年冬，国民党特务头子戴笠奉蒋介石之命，请被“严加管束”的张

学良将军写信给鲍文樾，劝他不要同汪精卫同流合污。鲍文樾原属东北军中的少壮派，曾任张学良的参谋长、东北军驻南京代表。西安事变之后，鲍被迫离开东北军，郁郁不得志，经周佛海牵线，投靠了汪精卫。张学良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欣然写信给鲍，叫他不要“做历史罪人，好自为之”。鲍接信后没有理睬。后来，鲍当上汪伪南京政府军事委员、军政部部长。1943年，戴笠又请张学良写信给鲍文樾，要鲍反正，为军统效劳。此是张学良考虑到自己已被囚禁7年之久，失去政治权力，便借此机会向蒋介石索取一根钓鱼竿。戴笠向蒋介石报告说：张学良太小气，连一根钓鱼竿也舍不得花钱买。蒋介石答：你懂得什么，这是他暗示我，要他钓鱼必须释放他，要给他根政治权力的钓鱼竿。不久，张学良得到蒋介石所赠的一根美国进口的高级钓鱼竿，它能长能短、能缩能伸。张学良接到这根竿后气得直发抖，将它折断为几节，并对赵四小姐说：“老蒋要我‘能屈能伸’！”

张学良挽杨宇霆以明心迹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继父位任奉天督办及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职，他决定响应蒋介石“南北统一”的号召，抛弃五色旗，换上青天白日旗，张的“易帜”之举，立即受到和日本关东军素有勾结的杨宇霆的反对，于是张学良决计除杨。杨宇霆字邻葛，自命有孔明之风。自任张作霖的总参议以后，常以“一人之下”自居，尤其是秉承张作霖之命与日人多次谈判成功，又在反对郭松林倒戈事件中力助“大帅”，深受张作霖的赏识。张作霖死后，杨更加目中无人。“易帜”那天，奉天八门、八关商店及住户悬旗祝贺，唯有杨公馆挂五色旗，意在藐视，反对东北归顺南京。杨宇霆还决定利用支持常荫槐出任中东路督办一事，逼张服从己意；张学良决定将计就计，当杨、常来到张公馆时，密令卫队将二人就地处决。杨长张学良16岁，且深受乃父器重，是张的父执。毙杨虽因杨多行不义，是为国除奸，然礼义不能不讲，于是，张亲题挽联一副，一为追悼，二为表明心迹：

距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痛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为管叔误流言。

此联明白宣告天下，杀杨是不得已而为之。上联用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字幼常）典故，明示杀杨时的心情；下联借《诗经》句：“我徂东山，惓惓（按：久远义）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用的是周公东征典故。当时武王初表，周公摄王位，管叔等在国内散布流言，说：“公将不利于孺子（指谋害成王）”，商人残余势力见机可乘，联合旧属国起兵反周。管叔等，终于巩固了政权。此联明正杨宇霆的罪行。

宋庆龄出生在何处

宋庆龄出生地在何处，目前说法不一。《上海风物志》上说是在广东文昌县。还有的说是在上海东余杭路、陕西北路静安区某医院。宋庆龄陵园的碑文上也只是说在上海。据川沙县志办同志考证，宋庆龄出生在川沙县城厢镇。

清华大学教授、黄炎培的三子黄万里说：1949年6月25日，黄炎培自北京来沪，到川沙城为其二子黄竞武烈士落葬，曾指着一所房屋说：“这就

是了不起的宋庆龄出生的地方。”当时黄万里在旁，亲耳听见了这句话。黄炎培年长宋庆龄 15 岁，且黄家与宋家曾同住川沙城南市街内史第房屋，是毗邻之家，备知内情。

宋庆龄为什么会姓宋

1967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了美国人包华德主编的《民国名人传记辞典》，其中列有介绍宋庆龄父亲宋嘉树的条目，词目写的是——“宋嘉树，原名韩乔荪（音），别名：耀如”。1985 年初，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撰写的《宋家王朝》一书由纽约哈泼斯——罗公司出版，立即引起了美国书评界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密切注意，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这部倾注了作者 15 年心血的著作，在第一章再次宣布宋嘉树及其子女“姓韩，不姓宋”。这一说法在港台引起了争议。

宋庆龄祖居之地在海南岛文昌县的昌洒区牛路园村。事实上，宋庆龄的远祖是河南相州安阳人。战国七雄之一韩国的版图就在这一带。韩姓渡琼的第一代始祖叫韩卿，南宋时代为先后出任浙江会稽县尉和文东廉州太守。此人颇有才，但一生未被重用，退职后于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 年）携眷属和家谱来到尚处于开发阶段的海南岛，在文昌县的锦山区定居。据考证，宋代汉人迁入海南者约 10 万之众。

宋嘉树的祖辈并不是商人，而主要以务农为主。据现存宋嘉树曾祖父韩仁循的墓碑推断，当时韩家的生活状况近于小康。所以死后置有祭田，让子孙轮流耕种。

目前只有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老人一人在此。韩家祖宅是两间正屋（一间正屋有三间横室），一间厢房。清同治丙寅年（1866 年），宋庆龄的父亲就出生在这里。韩家祖宅西约 100 米处的牛酸树林中，有宋庆龄祖母韩王氏的坟地。坟头已平，坟前仅有一小块花岗石墓碑，中刻“清韩妣王氏之坟”七个字。从墓葬的规模，也可断定韩家当时绝非富户。

宋庆龄的父亲原名韩教准，后为什么会改姓宋呢？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个谜。其实，韩教准改换姓氏的原因相当简单，那就是因为他被堂舅收养，而堂舅家姓宋。

韩教准的叔叔叫韩鹏翼，娶宋氏为妻，生有二子敬准、效准。宋氏为人勤劳温顺，但不知其名。因她娘家住在现属昌洒区的昌后村——该村村民全都姓宋，故人们尊称她为“昌后婆”。现在宋庆龄的堂弟韩裕丰家，保存有 1919 年秋为韩宋氏立的墓碑，中刻“韩祖妣宋孺人墓”7 个大字。韩宋氏的弟弟（韩教准的堂舅），就是早年赴美国修筑铁路的海南岛移民之一。

大约在 1875 年，年方 9 岁的韩教准随长兄政准到东南亚谋生，在马来西亚一个亲戚家当佣人，立了 3 年契约。1878 年春韩教准的堂舅回文昌探亲，见到韩鸿翼，说他在美国立稳了脚跟，生活不错，但由于没有孩子，经商缺少帮手。韩鸿翼动了心，同意将韩教准过继给他当儿子。同年夏，韩教准的堂舅返回美国，途经马来西亚，便将 12 岁的教准带到了波士顿。韩教准到美国之后，改名为宋嘉树，号耀如。

很多事实表明，宋嘉树及其子女承认他们是海南岛文昌人，而且本来姓韩。宋庆龄也承认文昌是她的祖籍。宋庆龄去世后，文昌县委决定，将宋庆龄祖居所在地改名为宋庆龄乡。海南行政公署还拨款重修了宋庆龄祖宅，供

人们瞻仰。

宋庆龄与孙中山结婚的地点

宋庆龄、孙中山在日本结婚的具体地点一向有三说。一是在东京原宿的“中山寓”，一是在宫崎滔天家，一是在梅屋庄吉家。以第三说较为可信。梅屋庄吉早年在日本经营电影公司，又在香港等地经商。他是孙中山在日本活动的重要经济支持者。

据梅屋庄吉的女儿千势子回忆，孙、宋二人的婚礼是在1915年10月25日在她家中举行的。虽然当时她才5岁多一点，但成年后仍然记婚礼的热闹场面。千势子的母亲也对她说过，出席孙、宋婚礼的嘉宾有60多人，都是日本人，梅屋庄吉夫妇为证婚人，婚礼后，一对新人又与他们夫妇结为义兄弟和义姐妹。

宋庆龄对她和孙中山的婚姻誓约书的说明

1913年，孙中山发动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以后，袁世凯企图派人暗杀他。孙中山被迫于这年8月初逃亡日本。他在日本重新集结革命力量，组织中华革命党，准备发动讨袁的“三次革命”。这时，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正在为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宋庆龄刚从美国梅肯韦斯莱茵学院毕业，也来过东京看望父母亲。在这一期间的日常接触中，宋庆龄很仰慕孙中山的为人和革命精神。1915年3月，孙中山将分居多年的卢氏夫人从澳门接到东京，经过协议，办理了离婚手续。后来，孙中山写信给宋庆龄，问她是否愿意来日本和他共同生活，并参加革命工作，宋庆龄欣然同意。1915年10月24日，宋庆龄到达东京，住在日本朋友头山满先生夫妇家。第二天（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和宋庆龄在东京律师和田瑞家举行了婚礼。他们委托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厅办理了结婚登记，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孙中山和宋庆龄的婚姻誓约书一式三份，分别由孙中山、宋庆龄和律师和田瑞各保存一份。

中国历史博物馆在1962年从私人手中征集到了这份誓约书。在进行鉴定时，有关同志提出了三个疑问：第一，为什么誓约书上写的日期是“1915年10月26日”，而不是25日？第二，为什么宋庆龄的签名用的是“琳”，而不是“龄”？第三，为什么宋庆龄没有用印？带着这三个疑问，他们于1962年8月11日将誓约书的照片寄给了宋庆龄同志，请她鉴定真伪，并解答上面三个疑问。

不久，宋庆龄同志通过她的秘书室作了答复，内容摘要如下：

“这份誓约书是真的，系孙中山和宋副主席于1915年10月25日在日本东京结婚，由日本名律师和田瑞到东京市政府办登记手续后所签法律上的誓约书。但因日本风俗以双日是吉日，故接受律师的建议将25日写为26日。在抗日战争时，存于上海孙中山故居的孙中山先生和宋副主席的结婚誓约书二份，已为日本军阀掠去，可能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

这个答复证明了誓约书是真品，并回答了日期的问题。但是第二、三两个疑问仍然没有得到解决。1980年3月18日，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同志将这份誓约书原件，送宋庆龄题字。宋副委员长见到了誓约书原件十分高兴，欣

然在卷尾余纸上题了“此系真品”四个字，并签名盖章。

宋副委员长秘书室将上述原件退还中国历史博物馆的时候，还附函作了如下说明：“誓约书上的日期为10月26日是照日本老规，以双日为好而写的，结婚日期实为10月25日。宋副委员长在婚姻誓约书上用‘琳’字是因为‘琳’字容易写。当时从美国去日本，因而没有图章可盖。”这一次圆满地解答了前面提出的三个疑问。

附：誓约书（译文）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1. 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2. 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3. 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声名，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 孙文（章）

同上 宋庆琳

见证人 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宋庆龄为何不葬中山陵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于1981年5月29日在北京病逝。她在病重时，仍常常谈到孙中山，有次服药时，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知道许多药名和怎样服法，都是孙先生教我的。”临终前，她对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上海住处还有中山先生许多衣物，每年都是由李姐（李燕娥）负责晾晒，现在李姐故去了，只得由我整理了。等我身体稍好后，你帮我一起把中山先生的衣服整理整理吧。”她反复嘱咐，要把她的骨灰盒送到上海安葬。这除了她父母的墓地在上海这个原因外，还由于上海有中山先生的故居，有中山先生的许多遗物；她不愿安葬在中山陵，还因为她历来都要求自己，不凭借伟大人物的妻子的身份来赢得声誉。

蒋宋龃龉秘闻

居住在美国纽约的李默庵在《团结报》发表文章说，我在1988年8月1日的《中报》上，看到叶一舟先生所写的宋子文一段掌故，触发了我也来写这篇宋子文与蒋介石发生冲突、因而失去财政部长职位的鲜为外人所知的经过。

在江西对共军作战期间——1931年至1935年，我任第十师师长。

当在江西对共军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即趁暑期在庐山召开会议，为加强各部队活动力，及争取战地人民好感决定对各部队增加作战费用。

是时恰逢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新自美国归来，交涉以美国棉花、小麦实物作价5亿美元的借款成功。宋志得意满，特到庐山向蒋介石报告。蒋氏

听取经过情形后，即提出江西仍将对共军用兵，必需增加军费若干。宋即以限于预算未予同意。两人不欢而散。翌日上午，蒋再约宋来谈增加军费问题，宋仍一如昨日，以不能超出预算而予拒绝。蒋即怒而离座，进入内室。宋子文无趣地自返南京。

蒋介石即决心更换财政部长宋子文。当日下午，蒋氏令当时亦在庐山的俞飞鹏、蒋鼎文二人来见，当面告知：我已决定樵峰（即俞飞鹏）去接任财政部长，铭三（蒋鼎文）即去帮樵峰办理接收。你们二人可即去南京，等候命令。

俞飞鹏、蒋鼎文二人到达南京后，即住进中央饭店。不到一小时，蒋夫人宋美龄就来电话找蒋鼎文说话。

蒋夫人说：“铭三，你和樵峰来南京，是奉令要樵峰接任子文的财政部长！”

蒋鼎文故作否认有此事。又据蒋鼎文称，他事后得知，当宋子文在庐山两次拒绝蒋介石要求增加军费闹得不愉快，返抵南京后，蒋夫人即电蒋介石称：子文返抵南京后，自知错误，拟再来面谒如何。蒋已经决心更换宋子文，当即复电：“不必。”

数日后，报载：“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照准，以孔祥熙接充。”

蒋鼎文又谈及，宋子文要搞个人权力的一些事实为蒋介石所不容，故蒋氏决心更换并非偶然。

宋子文是有政治野心的，以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到政治地位，因而竭力进行军事活动。除力交张学良外，另外，对杂牌部队形同收买以示讨好，但对蒋介石要钱反以限于预算予以否决。

此外，宋还在财政部税警名义的掩护下，自行建立军队，几年中已成立三个团，编成一个总团，其装备和武器优良，均由财政部自行购自美国，其官兵待遇薪饷也高出国军许多，是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私人武装。

财政部长宋子文辞职后，没多久时间，宋子文所建立的私人武装也就烟消云散了。

共产国际十位主要来华代表的最后归宿

共产国际曾先后向中国派遣了许多代表和顾问，具体地实施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在来华的国际代表中，与中国革命关系较深的主要有 10 位。他们离华后，由于各种复杂的政治原因，其最后归宿是很不一样的。

1. 离华后，曾做过有益于中国革命工作的有 1 人：

维金斯基。共产国际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他对中国革命的主要贡献，是帮助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但维金斯基在中国大革命时期支持陈独秀，犯有右倾错误，大革命失败后，维金斯基调返前苏联，从此便脱离了共产国际常务工作。

维金斯基离华后，仍然关注、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为中国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以后，维金斯基先后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维金斯基为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而欢呼。他一生撰写的几百篇学术论文和政治文章，对研究中国革命和东方革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在共产国际代表中，维金斯基是极少数没有受到共产国际、联共（布）党内政治斗争冲击的人之一。1953

年，维金斯基在莫斯科病逝，终年 60 岁。

2. 离华后，曾攻击中国共产党、歪曲中国革命历史的有 1 人：

李德。德国人。1932 年受共产国际派遣来华。在他担任红军军事顾问期间，由于他一系列错误指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的失利。李德在中国党内是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国际代表，1939 年秋，被中共中央送回前苏联。

李德返回前苏联后，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不允许他再过问中国事务。在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周恩来、毛泽民等人，也对李德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李德拒不接受批评。1949 年，李德返回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中苏关系破裂后，1964 年，李德发表了《毛泽东以谁的名义说话》等一系列反华文章，开始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1973 年，李德出版了他的回忆录《中国纪事》，完全背离了共产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极力歪曲中国革命的历史，攻击和诽谤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并为自己在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的错误进行辩解。

1974 年 8 月，李德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病死，终年 74 岁。

3. 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的有 2 人：

马林。荷兰人。1921 年 6 月来华任共产国际代表，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都起过重要作用。1923 年 10 月，奉命调返莫斯科。

马林回到莫斯科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任职。由于他在一些问题上与东方部意见不合，便于 1924 年 4 月辞职回到荷兰，担任荷兰共产党的领导工作。在共产国际反对托、季联盟的斗争中，由于马林感到自己日益同情托派，遂于 1927 年退出了荷共。1929 年，他建立了一个托派组织——社会革命党，公开与共产国际分道扬镳。但在 1938 年他又拒绝参加托洛茨基的第四国际。

在共产国际代表中，马林的最后归宿是最为悲壮的。1940 年，德国占领荷兰后，马林即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出版秘密报纸《斯巴达克》，从事抵抗运动。但不久不幸被捕，于 1942 年 4 月被德国法西斯杀害。

罗易。印度人。“四·一二”政变前夕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华首席代表。在大革命的紧急关头，罗易未能拿出有力的措施挽救中国革命，却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擅自送给汪精卫，使汪精卫找到了公开反共的借口。毛泽东曾就此事批评罗易是个“蠢货”。

1927 年 8 月，罗易回到莫斯科，曾要求与斯大林见面，遭到拒绝。在中共六大和共产国际六大上，罗易都受到了尖锐批评。但罗易对国际六大的一系列决议持反对态度，并发表文章攻击共产国际。1929 年 12 月，罗易被共产国际开除。此后，罗易逐渐走上了反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叛马列主义的道路。二战以后，更蜕变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大肆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1954 年 1 月，罗易在台拉登寓所病死。

4. 在共产国际、联共（布）党内的政治斗争中丧生的有 6 人：

越飞。苏俄政府派驻中国北京政府的全权代表，1922 年 7 月来华。在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越飞是一位重要人物。

1923 年 7 月，越飞返回前苏联，继续从事外交工作，但很快被卷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党内的纷争中。越飞因与托洛茨基关系密切，一直受到排挤和打击，被完全停止参加政治活动，甚至有病也得不到应有的治疗。1927 年 11 月 7 日，托洛茨基组织了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示威，遭到了联共（布）的

严厉镇压。越飞感到自己的政治生命已经终结，加上日益难以忍耐的病痛，于 16 日凌晨自杀。

加拉罕。1923 年 7 月，加拉罕接替越飞，担任与中国北京政府谈判的全权代表。他是中国北方革命活动的支持者，促成了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国民党的合作。1926 年 8 月应召回国。

加拉罕回国后，从 1928 年到 1934 年担任副外交人民委员，负责发展前苏联与东方各国关系的重要工作。因加拉罕早年是托洛茨基“区联派”的重要成员，1937 年肃反运动开始后便遭逮捕，12 月被公开判处死刑。直到苏共二十大后才恢复了名誉。

鲍罗廷。从 1923 年 9 月至 1927 年 7 月，他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治总顾问的身份参与了国民党改组、建立黄埔军校、进行北伐等重要活动。外国人称他是“中国革命的保姆”。但鲍罗廷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叛变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一定责任。

大革命失败后，鲍罗廷奉命回国，他回国后，行动即受到限制，被停止了在共产国际中的工作，斯大林也拒绝见他。中共六大严厉批评了鲍罗廷，认为他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重要责任，共产国际还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查鲍罗廷的错误。

1931 年，经斯大林批准，鲍罗廷担任了由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创办的英文报纸《莫斯科每日新闻》的编辑主任。这时的鲍罗廷，异常小心谨慎，尽量躲避派系之争。二战以后，苏、美关系日趋紧张。1949 年 1 月，前苏联政府错误地指控斯特朗为“间谍”，并将她驱逐出境。这一错案也株连了鲍罗廷，使他被捕入狱。1951 年 5 月，鲍罗廷在西伯利亚雅库茨克劳动集中营死去。终年 67 岁，直到 1964 年才恢复名誉。

加伦。1924 年 10 月奉命到中国担任前苏联驻华首席军事顾问，协助孙中山主持军务和改组国民革命军，制定了北伐计划，指挥了北伐战争，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叱咤风云的人物。1927 年 8 月回国。

回国以后，加伦凭借自己杰出的军事、政治才能，活跃在前苏联政坛上。他是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历任前苏联红军高级指挥职务。1929 年 11 月“中东路事件”爆发后，加伦指挥前苏联特别远东军，大败张学良东北军，并将 1 万多俘虏押到前苏联境内开采金矿。1935 年，加伦被授予元帅军衔。1938 年 1 月，加伦又指挥哈桑湖战役，粉碎了日军的挑衅。

在 1938 年 11 月肃反运动中，加伦以“叛国罪”被秘密枪决，年仅 48 岁，60 年代中期以后，前苏联政府为加伦平反昭雪。

罗明那兹。大革命失败后以共产国际代表身分来到中国，接替罗易、鲍罗廷。罗明那兹对中共“八七”会议的召开起了重要的作用，但他的“不断革命论”却导致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出现。他于广州起义前回国。

由于广州起义的失败，罗明那兹在共产国际六大上受到了严厉批评，并被排除在共产国际的领导机构之外。以后，罗明那兹在高加索负责经济工作。因为他不赞成斯大林的集体化政策，1930 年底，即被指控为组织反党集团，解除了党内外的一切领导职务。1934 年 12 月，基洛夫被刺后不久，罗明那兹自杀身亡。同年底，被开除出党。

米夫。对于中国革命来说，米夫主要起的是消极作用。他一手把王明宗派集团扶上了台，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内的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后，米夫回到前苏联，仍然与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

代表团在工作上保持着密切联系。米夫一直是紧跟斯大林的，但不知什么原因，肃反运动也给他带来了灭顶之灾。1938年10月，米夫被秘密处决，时年36岁，1976年才获平反。

蒋介石身边的日本间谍

1937年“七·七”事变后，8月初，国民党政府最高当局蒋介石、汪精卫等在南京行政院召开绝密的最高国防会议，准备先行消灭驻防在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在江阴部署封锁线，拦截与俘获停泊与行驶于江阴以上长江各口岸的全部日本军舰与商船。这次会议决定是当时我国最重大的国防军事机密，然而，在蒋介石命令还未下达到有关军队之际，突然，在南京、武汉、宜昌、重庆等长江中、上游各口岸的日本军舰、商船及原住在这一带的日本侨民，于8月7日一日夜之间，全部飞速撤往长江下游，冲过了江阴水面。

不久，上海“八·一三”战事发生，蒋介石准备亲自到上海巡视。在一次最高层会议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建议蒋介石搭乘英国大使寇尔的专车前往上海，当时英国宣布中立，车上有英国标志，日本飞机是不会对其袭击的。蒋当时表示首肯。然而在第二天，寇尔的汽车竟然遭到了日军飞机显然有目的的轰炸，寇尔受重伤。蒋介石因临时变更计划未乘此车而幸免于难。

这一件件重大案件，说明蒋介石身边就有日本间谍。经情报机关侦查，终于查明经常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参加最高军政会议、担任记录的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竟是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的汉奸与间谍。此人早年留学日本，与日本政界人物关系密切。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入行政院为机要秘书，颇受汪精卫与蒋介石信任。他的儿子黄晟也从日本留学归国，在外交部任职。黄浚挥霍无度，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为了取得大量金钱，黄浚带同其子黄晟，被日本特务机关收买，成为日本的间谍。

在南京沦陷前夕，黄浚父子以卖国罪被处极刑，其他从犯分别判处徒刑。

三十年来死于空难的各国领导人

1988年8月17日罹难的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是30年来死于空难的第7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前6位是：

1986年10月20日莫桑比克总统萨莫拉·马谢尔，在南非上空遇难。

1981年8月1日巴拿马领导人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死于巴拿马西部上空。

1981年5月24日厄瓜多尔总统海梅·罗尔多斯·阿吉莱拉，在该国与秘鲁边境处的飞机失事中遇难。

1980年12月4日葡萄牙总理弗朗西斯科·萨·卡尔内罗，在里斯本附近上空遇难。

1979年5月27日毛里塔尼亚总理艾哈迈德·乌尔德·布塞夫座机在达喀尔附海面失踪遇难。

1959年3月29日中非共和国政府首脑巴泰勒米·波冈达，在该国首都班吉附近约90公里处遇空难身亡。

世界最穷的国家元首

非洲的布基纳法索的总统桑卡拉，月薪只有 13.8 万非洲法郎，合港币 3600 元，加上他的妻子的月薪 19.2 万非洲法郎，合港币 5000 元，却要维持双亲及 15 个孩子的生活费用。他们的家产计有：一间以分期付款方式购买的普通住宅，至今尚欠 67 万非洲法郎；一辆日产小汽车；两架比赛用的单车（桑卡拉喜爱的运动）；两部电视机；一个雪柜；一个坏了的冰柜。

桑卡拉的收入这样微薄，原来背后有一个崇高的理想。自从 1983 年他领导政变成功后，几年来痛感官员贪污腐化是如今非洲社会最危险的祸患，1987 年初，他下令成立全国反贪污委员会，重点审查各级官员的贪污走私、行贿受贿案件。他自己亦以身作则，将别人赠送的四辆不同型号的小汽车和累计约 2 亿元港币，交给国家，将本人应得的巨额职务津贴放弃，并且削减自己的工资。

各国首脑下台后干什么

有些国家首脑属于终身任职，在正常情况下是首脑任职直至死亡；在非正常情况下，被武力推翻的首脑不是被处死，就是遭到监禁、流放。但是这类国家也有极少数首脑自动退位，他们下台后能过平静的生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班牙国王查理五世在战争中遭到失败，因而决定退位，就把德国的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弟弟斐迪南，把西班牙和尼德兰的统治权交给了他的儿子腓力，自己则隐退到西班牙的一个修道院里。这个修道院座落在一个小山上的橡栗树林中，房屋建筑极为豪华，一些餐具是工艺精巧的纯金制品。他爱吃各种鱼。以听音乐、听讲道、玩弄机械玩具为消遣。由于查理五世在位长达 40 年，到退位后，他对治国的辛劳深有所感，对光荣和业绩已深为淡薄，人世间值得他迷恋的事情已经不多，因此，他在晚年深深地沉浸在宗教中，他竟定期地和修士一起以抽血来折磨自己。

拿破仑是被武力推翻的首脑。他下台时年仅 46 岁，被流放到大西洋中的圣赫勒拿岛。在这个岛上，拿破仑可以独自一个在一个周界达 12 哩的三角地带内自由走动，因而他经常全副身心地投入户外消遣活动，如散步、骑马、从事园艺活动。在室内，除撰写回忆录外，还下棋，打弹子，和邻居一起朗读文艺作品。拿破仑在丧失一切权力后的平淡生活中，把他在当权时期受到压抑的性格特征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他经常和邻居的两位十四五岁的女孩一起玩“惠斯特”牌戏，乐意回答她们提出的稚气十足的问题、玩到高兴时，拿破仑和两位小女孩一起扮瞎子捉迷藏。可见，权力可以使掌权者丧失人性，而权力的丧失可以使掌权者恢复人性。

相当多的国家的首脑不终身任职。这类国家的首脑在任期届满离职后，通常有一个正常的生活，即使首脑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被迫下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有一个比较正常的生活。西奥多·罗斯福 42 岁担任美国总统，45 岁连任，50 岁时卸去总统职务。离职后，他到非洲去狩猎，率领探险队远征巴西丛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还请求准许他率领一师志愿军前往欧洲。哈里·杜鲁门卸任总统后，活了 20 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和妻子贝斯一起过着宁静的家庭生活，和朋友交往，写回忆录，建造以他自己名字命名的图书馆。林登·贝恩斯·约翰逊 60 岁卸任总统，64 岁去世，4 年中专心致志地经营他的牧场，他象一个普通农民一样，不关心政治，而十分关心牛肉和猪肉

价格问题。为了确保卸任总统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条件，美国政府规定，卸任总统的退休金相当于现任内阁成员的薪金。他们还都有一个庞大的办公处，办公处的各项费用由政府维持，卸任总统还都可以以自己的名字建立图书馆，并由美国政府支付图书馆的建筑费用和工作人员的薪金。有些卸任总统继续从事着繁忙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尼克松、卡特、福特下台后都过着舒适豪华的生活。福特担任十几家大公司的顾问，一年收入近百万美元。卡特喜欢做木工活，他写回忆录，写累了就到木工房做一会儿木工活。1984年8月，卡特参加了美国佐治亚州40名木匠组成的志愿队，到纽约为贫民义务修房。

首脑下台后的生活一般是平凡的，并不存在一条和普通人截然不同的鸿沟。首脑和普通人一样生活着，但他们对自己失去最高权力这一点却有强烈的感受。在他们担任首脑期间，源源不断的电报、文件、来信、公文需要首脑处理，来访者无一不带着尊敬和友好的态度，首脑不仅有高度的行动自由，而且有广泛的社会联系，然而下台后，“社圈”顿时缩小到原来的几百、几千、几万分之一，重要情报来源断绝了。他们只能象普通人那样从报纸杂志和为数不多的文件里了解一些情况。前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下台后，竭力设法诱使那些登门拜访的政界人士说出许多重要的情报，对他们真可谓是再三盘问，寻根究底。苏加诺是一位喜欢热闹的人，喜欢朋友环绕左右，谈论各种问题。他下台后，社圈突然缩小，深感寂寞。以往广交朋友，但现实表明，他的忠实朋友，极为稀少。

首脑下台后如果仍准备东山再起，或者仍用某种方式发挥积极的政治影响，主动地参加各种社会，那么，下台后的首脑也就会象一个为夺取首脑职位的人那样陷于繁忙的活动中。法兰西第四共和国总理更迭频繁，下台后的总理继续热心于政治活动。1952年3月安托万·比内担任总理，前任总理克耶、罗贝尔·舒曼、普利文都担任了安托万·比内政府的部长。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下台后，他从事写作，出版了几本著作，经常参加国内的各种会议并发表演说，先后出访了近20个国家，以个人身分同国内外要人频繁交往，就国内外的一些重要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从首脑职位上下台并不等于离开了政界，他们希望继续以某种形式发挥自己的作用。法兰西共和国宪法对卸任总统的职务作了规定，历届前任总统都是宪法委员会的终身当然成员。然而许多国家却无此类规定，首脑离职后只得各自“自谋出路”。离任的首脑是人类中的特殊人物，他们超脱了具体国家事务的纠缠，他们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政治阅历，有纵观全局的能力。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和世界范围内“首脑限任制”的推广，离任首脑的人数将日益增加。如果在世纪之交，能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离任首脑协会或世界首脑组织，将能为人类的事业——和平、交流、合作、发展的全球性事业作出愈益巨大的贡献。

为狗建造白宫的总统

美国前任总统里根，叫美国设计师奥·海斯为他的爱犬设计建造了一座“小白宫”，这间狗“白宫”室内有红色窗帘、镶木地板和里根夫妇的照片。

美国总统的待客之道

华盛顿和巴黎、伦敦一样，不仅是政治上的首都，同时也是文化和金融的中心，白宫的晚宴因此成为各界名流的社交场所，晚宴的菜色反而不怎么重要了。

里根夫妇最好客。他们在 8 年总统任期内请了将近 700 人到白宫做客，名单很少重复，绝大多数都只被邀一次而已。有幸到白宫赴宴的贵宾，在餐桌上都兴高采烈地在彼此的菜单上签名，留作纪念。

至于菜肴如何，客人总是说好极了，但是你要进一步问他是些什么菜时，他会显得惊异不已，仿佛你问的是老式南方典型丧礼中的菜肴如何一样，虽然是精心置办的，但事情的重点不在这里。美国人自己说，他们对食物“看”的兴趣要比吃来得大，这也算是艺术胜于口欲的一种形式吧。

尼克松请客重程序。白宫主厨的亨利霍勒说：

尼克松很多东西不吃，小羊肝他不喜欢，小牛肝他不喜欢，他不喜欢的东西多了，让人实在很难整治出一份像样的菜单来。”

尼克松吃得不多是因为他太在乎谁该坐哪里，谁的菜该先上之类的问题。他上任才半年就写了一张纸条给当时的白宫总招待，不厌其详地解释在各种情况下的上菜次序，可能还反复排练过，其间的曲折大概不下于和北越举行巴黎和谈时，为谈判桌的形状而争论不休的情况。

后来他又对基辛格的席位另作安排。据众议员霍德曼的一份备忘录记载：“……总统觉得不应该总让亨利坐在最出色的女宾旁边……徒然引起飞短流长，于事无补。”

至于余兴节目，肯尼迪曾邀巴布罗卡·萨尔斯举行了一次有名的大提琴之夜，但一般说来到白宫去主演的都是像胡立奥·流极受拉斯维加斯的观众欢迎的通俗明星。

卡特不喜欢狂欢气氛。卡特时代杜绝了这种狂欢的气氛，不但不喝酒不跳舞，有一次还在国宴之前做祷告。在一次招待墨西哥总统的晚宴上，他的女儿坐在一旁读希区柯克的《闹钟奇谭》。

布什夫妇甜点待客。白宫的松饼师傅说，布什夫妇是历任白宫主人中最喜欢招待客人吃甜点的，他们有的时候也到外面去吃中国菜或意大利菜。

裕仁铁事

首次受辱。1945 年，在日本的美国占领军司令部驻地岗哨如林、戒备森严，日本天皇裕仁衣冠整齐地来到这里，会见占领军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而麦克阿瑟在会见过程中履行了他事先做出的声明：他既不去迎接问候这位日本天皇，也不会到门口去送别他，他对天皇裕仁冷若冰霜。这次胜利者与失败者的会见，被人描述为日皇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所遭受的侮辱。

降格做人。日本宣布投降时，裕仁天皇在休战诏书中说：“我与我的国民的关系，不需要通过神化天皇的虚想来维持。”

据透露，裕仁回到皇宫后对他的妻子说：“你看我从现在起，是不是摆脱神变成人了？”

嗣后，裕仁离开皇宫视察了许多工厂、农庄，垂询他的臣民，因此，日本国民更加崇敬他。

偏爱西装。尽管日本国民每适节日喜欢穿传统的和服，但裕仁在家里却

偏爱西装。不仅穿着如此，就连吃饭也多用西餐，特别是早餐食谱，几乎和英国皇室成员的一样。

烟酒不沾。裕仁生前烟酒不沾，唯一抽过的一支烟是麦克阿瑟递给他的，他当时什么话也没说。他讨厌喝烈性饮料，但在他还是太子的时候，曾在伦敦陪英国王储们喝过一杯酒。

当众遭斥。1921年，当时的皇储裕仁决定乘巴黎的地铁一游，因为这种交通工具当时在日本还没有。

开始时，他试图不用地铁票通过检票处，因为他在日本乘火车时从来没有人向他要过火车票。尽管陪同他的侍从递给他地铁票，他却牢牢地把票握在手里而不愿给检票机打孔，结果，这位法国检票员发怒了，冲着裕仁吼叫，他并不知道这个外国人是日本未来的天皇。

裕仁同侍从一起登上火车时说：“我第一次遭到一个外国人的训斥。”他一直保存着这张票作为纪念，并把它放在皇宫办公室的抽屉里。

签名值万金。在纽约一个拍卖会上，已故日皇裕仁的一个签名，竟然以46200美元售出。这个价格为原订价的15倍以上。

这次拍卖活动是一个名叫达维克的人在纽约一家酒吧间里举行的。他在拍卖结束时说，喜爱这种东西的，是不能以某种价格来衡量的。竞投者约有100多人。他承认误断人们对裕仁这个人的兴趣。这个1934年的签名，被形容是写在“日本人极为罕有的早期‘国书’上”的，有几个人一开始就以高出预售价3000美元的价钱投标。最后以42000美元拍板。加上拍卖人10%的佣金，总价为46200美元。为一个日商代表纽约的一家日本银行投标得胜，而这家银行是代表日本一个买家参与投标竞争的。

这份国书是由蒙治霍的女儿售出的。蒙治霍是1934年1月及18日当选古巴临时总统的，而这份国书是裕仁给他的贺信。

据其中一位竞投者说，裕仁的签名，直到现在为止，是很少提到拍卖会上来的。

裕仁投降录音险遭毁灭

日本天皇的会议从长德川义宽以年迈多病已于最近退休。德川从事侍从职务已半个世纪，1985年升任侍从长。在德川退休的第二天，日本和美国报纸都首次报道了他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前夕的一次“勇敢的行动”。那是1945年8月14日夜，日本天皇裕仁看到大势已去，决定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于是口授“御言”录成音盘，准备向全国和全世界广播。消息不知为何走漏出去。当夜一群少壮军人突然闯入皇宫，挥舞战刀和枪支，狂呼日本坚决不投降。他们逼迫侍从人员交出天皇的“玉音”录音盘。那时，德川义宽只是一名低级侍从。他机智地将录音盘藏在女眷宿舍内的一个保险柜里。少壮军人威胁要用刀砍死他，他说：“你们可以杀死我，但你们仍然一无所得。”那个录音盘始终没有被搜查出来。8月15日上午，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声音便广播出去了。

卡斯特罗夫人之谜

古巴总统菲德尔·卡斯特罗无论是出国访问、接待外宾，还是出席在哈

瓦那“革命宫”举行的招待会，他总是独自一人，从没有第一夫人陪伴于侧。

那么，究竟谁是古巴第一夫人呢？据知，卡斯特罗于1948年第一次结婚，妻子是他在哈瓦那大学的同学美莎·达雅兹-巴拉特，两人一年后生下一个儿子。但这段婚姻维持不久，1955年卡斯特罗自我流放到墨西哥，两人即告离婚。

卡斯特罗此后有没有再结婚，没有正式披露。但古巴人知道卡斯特罗有一位红颜知己，她叫诗莉亚·桑切斯，两人一直公开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诗莉亚在50年代中期投身古巴革命。据曾为卡斯特罗写传记的作家塔德·斯苏克写道，多年来，诗莉亚一直“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人物”，她当时“36岁，未婚，极其聪明，有办事能力，乌黑的头发，很有吸引力，但并不漂亮”。

1957年初，当卡斯特罗率领的小股游击队陷于孤立时，诗莉亚加入游击队，成为卡斯特的副手。

古巴革命成功后，诗莉亚成为卡斯特的私人秘书，为他处理许多私人事务。1980年，诗莉亚因患癌症不治病故，终年59岁。她去世后，没有人取代她的职位。

爱马的摩洛哥国王

1990年是马年。如今世界上许多地方的所谓爱马人士，把马养得厚壮结实，无非是寄望它能在赛马场上一展雄风，为马主和赌客赚进大把钞票；对他们而言，爱马只是个借口，爱钱才是真的。马如果有所憧憬，它们的理想国其实不在各地马会，而是在北非的摩洛哥。

马是摩洛哥的国兽，主要是这个君主立宪国家的哈桑国王爱马所致。哈桑二世爱马出名，不过他爱的是阿拉伯的纯种马，血统不正不纯的杂种马就不在他的宠眷行列。正因为纯种马日益稀少珍贵，才使他不惜巨资搭建美轮美奂的“马宫”供爱马歇息，并有专业马师和最新科技一旁侍候。

哈桑国王身处20世纪，却憧憬《一千零一夜》中强盛富庶的阿拉伯盛世，这点浪漫心思，使他有了兴建“马宫”的行动，让他豢养的39匹纯种马都能享受帝王般的生活，过足“马王”瘾。

“马宫”的地点选在首都拉巴特和大城卡萨布兰之间波兹尼卡，外貌是典型的阿拉伯殿建筑。“马宫”里还有马具博物馆，展示各种马鞍艺术杰作，还有著名马师的马上英姿照片。另外，哈桑国王还精心布置了一间贵宾室，供马道同行与他大谈马经。

“马宫”里的39位“主人”，各配有一间马厩，每间都有前后门，前门供人出入，后门则通往“后花园”，是块草碧如茵的马场，马师每天就伺候着“主人”在此散步健身。每匹马平均都有6位专职马师照顾一天生活的大小事，不能出意外。

例如最获国王钟爱的骏马，每天“起床”后就由马师带着到后花园溜达，活动筋骨；神情气爽后，浑身上下难免冒汗，马师就会带它去有自动喷水设备的洗澡房冲凉，水温都由科学仪器控制，不仅让马觉得舒服，又不会伤及乍然开放的毛细孔，极合卫生原则。

由于哈桑国王爱马，摩洛哥人民也因此受了影响，每年秋季农忙后，全国各地马术高明的骑师，都按捺不住沸腾的心，飞身上马参加秋季大赛马。

摩洛哥人赛马主要是比装饰和速度，马缰绳和马头上的新奇装饰表示他们对爱马的尊重；虽然“马要金装”，但也不能太花哨，否则会影响马的奔驰速度。在赛场上，一声令下，但见众家好汉手持来福长枪，策马狂飙，眼见终点已到，骑师双手立即夹枪叩发，一时之间，枪鸣声、马嘶声、吆喝声和观众呼喝彩声同是爆发，人马同乐，形成一幅迷人的秋收赛马图。

戴高乐与迟钝女儿

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的夫人伊娃娜·戴高乐快要生安娜时，被汽车撞倒休克了。不久女儿出生，医生告诉戴高乐夫妇：这女孩将是个迟钝的失语低能儿。戴高乐夫人表示：“只要安娜像别的孩子那样成为一个正常的女孩子，夏尔和我愿意把我们的一切，包括健康、钱财、前程、事业统统放弃。”他倍加疼爱安娜，有人建议将她送往收养所时，戴高乐答道：“不是她自己要来到人间的，我们应尽力使他幸福。”

戴高乐喜爱同女儿相处，同她手拉着手，围绕着他们的庄园散步，抚爱她，轻声细语地对她讲些她能理解的事。他同她跳轻快舞，为她表演小哑剧、唱流行歌曲。让她她玩他的军帽，她一见这顶军帽，眼睛就发亮。她高兴时会发出相当清晰的声音，并像别的孩子那样笑起来，而戴高乐是唯一能使她发笑的人。当她疲倦了，便拉着她爸爸手去睡觉。

戴高乐成为抵抗运动著名的领袖，又被选为总统后，记者常为他摄影，他却从不允许把安娜照进去，以防别的孩子取笑她，让她痛苦。他廉洁清贫一生，却为安娜特别设立了委托金，以自己的回忆录版税为凭。不幸，安娜快过20岁生日时，死于肺炎。安葬仪式过后，戴高乐拉着妻子的手说：“走吧，现在她同别人一样了。”戴高乐逝世后，家人遵照他的遗嘱，葬于其女儿的墓边，永远陪伴她。

暗杀戴高乐未遂内幕

前以色列最高情报机构头目伊塞尔·哈雷尔最近在以色列电视台称，1961年，法国反叛军曾要求以色列情报机构协助他们暗杀前法国总统戴高乐，以情报机构不但未给予合作而且帮助戴高乐挫败此阴谋。

1961年的某一天，法国一名军官在巴黎会晤以色列驻法使馆武官伊扎克，提出若以色列帮助他们暗杀戴高乐，他们将保证对以色列增加军援作为回报。伊扎克立即把此情况汇报给当时任外交部长的梅厄夫人，梅厄夫人立即找哈雷尔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哈在电视台上回忆说，他当时提出有两个理由可将此事告诉戴高乐。第一，如果真有此阴谋却知情不报，以色列就会沦为阴谋的同谋。第二，法国人说以色列情报部门有些人是法国极端分子的朋友，这些人正是赞成建立一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人。

当时，戴高乐正在努力结束法国卷入阿尔及利亚战争，而法国军队中的一些极端分子则反对戴高乐所作的努力，主张把阿尔及利亚纳入法国势力范围，建立一个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于是图谋暗杀戴高乐。哈雷尔认为，法国军官告诉以色列此阴谋也许是要考验以色列的诚意，因此立即拜访了陆军总参谋长楚尔和国防部副部长佩雷斯，他们认为以色列不应卷入此案。随后，他又请示以色列总理本·古里安，他指示不能耽搁，应立即告诉戴高乐。

不久，戴高乐一网打尽卷入这场暗杀阴谋的法国军官，并处决几名主谋。

不相信原子弹的希特勒

美国历史学家麦乔治·邦迪今天说，希特勒没有原子弹，是因为他从不相信这种新式武器，而且他的顾问们也没有施加压力，要他制造原子弹。

据《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说，以海森贝格为首的德国科学家从来没有想到及时造出原子弹，以便在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因此，很少向希特勒提出研制问题，同时资金缺乏，科学家们的力量也未集中在一起。

希特勒的军备部长施佩尔知道，“元首”对任何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武器的新发明都抱有本能的不信任情绪。

施佩尔在大战结束后供认，在提交希特勒的 2200 份文件中，只有两次提及原子弹计划。

只有一份正式文件“略微”提到了铀计划，这份注明为 1942 年的文件说，铀计划被认为对战争没有价值，因此只拨了少量的研究费。

科学家们需要很多钱，但是军备部长施佩尔只给 200 万马克。据邦迪估计，纳粹德国用于研制原子弹的经费还不到美国曼哈顿计划的 1%。

邦迪说德国最有才华科学家没有力争得到更多的资金和资源，因为他们知道，假如希特勒给予重视，将逼迫他们迅速研制成功，而这在当时是不可能的。他还指出，德国人犯了一个技术性错误：他们拒绝采用石墨进行试验。

希特勒的怪癖

纳粹头目希特勒平生怪癖多，姑举数种：他虚荣心特别重，成为德领袖后，做过美化鼻子的整容手术，但他却禁止任何人拍摄他戴眼镜的照片。他除了头发和脸毛外，将全身的毛都剃去，无论天气多热，他都不会在公开场合脱掉外套。他还讨厌别人触摸他。他平时气壮如牛，若碰到不开心的事便会哭。有人说他是“男女性格的混合体——一个处于女性边缘的男性”。这个杀人魔王喜欢看囚犯被拷打和折磨的影片，但对宠物却非常仁慈。他养的鸟死了，他也会伤心落泪。他经常命令司机为他开快车兜风，时速达 100 公里；而他坐火车却限制时速不得超过 30 公里。他对手相有特别的研究，碰到人时首先观察对方手掌的形状、手指的粗细和指甲形状等。如果他不喜欢，便转身走开，扬长而去。他平时爱吃鸡蛋，为此特雇了一个懂得用 101 种不同方法烹调鸡蛋的厨师。他手臂瘦小，胸部下陷，但爱装扮，他衣柜里有 100 套军装，60 双长靴和 35 顶帽子。他最怕牙医，在拔牙时会因疼痛而大声嚎叫，但又不准牙医为他注射麻醉药。他在房间踱步时永不走直线，而是走对角线。

英国女王怎样教育儿女？

英国女王的丈夫菲利普亲王对于如何教育儿女，是有绝对权力的，女王在这方面也要让他三分，亲王的一贯态度是对 3 个儿子管都得非常严格，却溺爱独女安妮公主。

菲利普亲王在他 26 岁那年便做了父亲，到幼子爱德华出生时，他已经是

43岁的中年人。打从长子查尔斯出生时开始，他便决心做一个严父。

亲王对长子查尔斯非常严厉，因为王储幼时，他还在英国海军服役，离家时多，怕长子在女王、皇太后和保姆的溺爱之下，会变成一个没用的人。所以打从查尔斯还是一个几岁的孩子时起，亲王命令他每周三次上一间私营的健身室，接受体育和拳击训练。

亲王对3个儿子，从不假以辞色，做错了事，必受体罚，而且出手很重。身为长子的查尔斯处境特别困难，他对父亲又敬又怕，一方面要做3个弟妹的典范，而在皇太后和女王、甚至宫中的仆役面前，他又必须是一个可爱的小王子。当时年经小小的查尔斯，真有无所适从之感。查尔斯自己做了父亲以后，宠爱3个儿子，并不将他父亲严厉家教搬过来对自己的儿子，可能是“曾经此苦”的缘故。

查尔斯可以说从来没有给父亲带来任何烦恼，不过次弟安德鲁一度与脱星史塔克鬼混；幼弟又舍弃王室传统，脱离英海军陆战队，予人以懦夫印象；安妮公主和附马爷并不和谐，曾被传和她的私人保镖有暧昧关系，对这些事亲王虽然表面上一声不吭，但内心一定不好过。

皇室情书

1990年的情人节(2月14日)在伦敦展出了100封英国皇家情书为恋人们助兴。

这些信有的激情澎湃，有的伤感缠绵，有的坦诚无比，有的语句甜蜜。其中资格最老的是亨利8世写给安妮·博林的密信：“我最亲爱的，自你离开后我感到了巨大的孤独……”然而8年以后，正是这位多情郎下令砍去了安妮的头！

1901年至1910年在位的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是位多情的种子，以拥有众多的情人而著称，人们一直以为这位风流君主求爱手段非凡，写的情书也一定是温情脉脉，然而他的情书所写的无非是天气如何如何，读后味同嚼蜡。

爱德华七世的父母是阿尔伯特亲王和维多利亚女王。在教科书中描写的是：维多利亚女王完全被阿尔伯特迷住了，而阿尔伯特对她却很冷淡，整天关心的只有国家大事。可是从亲王1840年结婚前写给维多利亚的信中，人们看到的却是另一个阿尔伯特：“最亲爱的、至爱的维多利亚……你写的那封亲亲切切的信使我陶醉，因为它又一次告诉我你是多么地爱我……可曾记得在那间可爱的蓝色小房间里，我是怎样天天暖着你那迷人的小手——每当空闲时，我都沉浸在那些美好回忆中……”

最后展出的一封情书是爱德华八世写给美国孀妇沃丽丝·辛普森夫人的：“我亲爱的人哟，上帝啊！我爱你，我亲爱的沃丽丝……让那醉人的日子(指结婚)快点到来吧！上帝，愿你永远保佑我们。”这是1936年他们结婚前爱德华八世的心声，后来，这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君主放弃了王位，与沃丽丝过起了平民生活，始终恩爱如初。

王后的玩具小屋

英国的温莎城堡，有一座游客喜爱的玩具小屋。那是英国乔治五世的妻

子玛丽王后当年心爱的玩物，实际上是王后的微型王宫。

相传玛丽王后酷爱收藏微型家具，他的好友玛利·路易丝公主因此想出了为她建造微型宫殿作玩具小屋的主意。路易丝公主请当时最有名的王室建筑师埃德温·勒琴斯负责设计这座微型王宫。

这座微型王宫长 259 厘米，宽和高均为 152 厘米。整座建筑分 4 层，有 40 多间装有电灯的房间，还有酒窖。每层楼之间，设有两道楼梯和电梯，5 间浴室都装有冷、热自来水管，最底层的车房停放着 6 辆微型汽车，此外还有一座花园。

王后的寝室仅 76 厘米宽，室内的床罩镶满了珍珠，梳妆镜的四周镶着真正的钻石，浴室的地板用珍珠母铺成。宫内的微型家具做工十分精致，餐室内还摆着 230 件微型银餐具。

最令人叹为观止的还是宫内的图书馆，馆内收藏的书籍和各种艺术作品都是真品的微缩，据说由 700 名艺术家仿制而成。书本大约只有 2.5 厘米高，包括《圣经》和许多古典名著，有些名著还保留着作者的手写本，字迹模仿得跟原著一模一样。当初勒琴斯接受路易丝公主的任务时曾经说过：“我们创作的这件作品，不但要让子孙后代从中了解 20 世纪英国国王和王后的生活方式，而且要让他们了解，这个朝代的作家、艺术家和工匠都是了不起的天才。”

为了实现勒琴斯的心愿，英国王室把这件国宝献出来让世人观赏，并将筹得的款项用于慈善事业。

英皇室的健身秘诀

英国皇室成员终日马不停蹄地工作，他们却总是精神奕奕，很少因病取消任何官方活动。究竟什么是他们保持健康的秘诀？

英皇室人员笃信预防性的生活方式，他们知道烟酒不利身心，便严格力行克制自己；他们认为新鲜空气有益，只要一有机会，就往户外跑。曾任查尔斯王子保姆的梅宝安德逊说：“皇家成员对新鲜空气似有种难言的兴趣。不论气候多么恶劣，全家一道外出踏青的节目从来不会取消。”

其次是注重动动。查尔斯王子说，只要打过一马球，他立刻焕发精神。王妃戴安娜除了每天清晨固定的白金汉宫温水泳池来回游 30 次外，每周还打两次网球，上一次芭蕾韵律课。

戴安娜说，她之所以能保持令人羡慕的身段，与外传节食无关，运动才是主要的功臣。其实正确应该是双管齐下的结果。曾伴随戴安娜参加过不计其数国宴的典礼官史宾塞说，戴安娜为了能与宾客聊天经常忽略了盘中美食，顶多吃些面包，主食几乎是象征性地碰一点，每餐永远只吃一个马铃薯，拒绝所有甜食。她在家中严格遵守高纤维、低脂肪的饮食。女皇的饮食习惯，则更简单。据为女王作传的安摩若介绍，来访客人经常会惊讶地发现，女王仅以一根芹菜、几片莴苣叶就打发了中餐。不过，女王每天必喝好几瓶矿泉水，这或许是她迄今能保持良好肤色的缘故。除了吃得简单外，女王最喜欢的运动是骑马，若遇上天气不佳，则改为遛狗。

最有发胖倾向的恐怕是莎拉及爱德华王子，因此他俩都极认真地奉行限制热量的饮食习惯，尤其是莎拉，每天还参加 45 分钟的运动，但为了补充体力，莎拉多年来坚持饮用蜂王浆。

皇室中最忙的安妮公主，本来就属运动型人物，再加上她奉行“盘中食物永远只吃一半”的座右铭。苗条健康自然与之相伴。

除了有良好的饮食习惯之外，皇室人员都喜爱户外活动，戴安娜爱跳舞，爵士舞、健康舞、芭蕾舞都在喜爱之列。爱德华王子则爱好打猎，这样亦能消耗多余的热量及脂肪。皇太后虽然已80多岁高龄，但同样爱户外活动，她尤其喜欢带着爱犬或与知己友人到海边漫步，一边散步一边谈天说地。

林肯为什么留胡子

今天，人们很难想象，亚伯拉罕·林肯如果不留连鬓胡子，该是个什么样子。那么他为什么要留连鬓胡子呢？原来是出于一位小姑娘的建议。

在韦斯特菲尔德住着一位名叫格雷丝·比德尔的小姑娘。一天晚上，当她独自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凝视林肯的照片时，她突然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似乎在林肯清瘦的脸上出现了连鬓胡子，“如果他真的长一副这样的胡子该多好啊！我一定告诉他。”

她马上拿起笔给林肯写信，在信中她说：“如何你留连鬓胡子的话，你将会更有风度，这样所有的女士们将让她们的丈夫投票选举您，您将成为总统。”

使小姑娘惊奇的是，4天以后，她收到了林肯的回信。更令她欣喜的是，翌年2月16日，亚伯拉罕·林肯将接见她。

那天早上，她得知新当选的林肯总统将在韦斯特菲尔德附近的车站做短暂停留，因此，格雷丝很早就起了床，前往车站迎接总统。

由于格雷丝个子特别矮小，车站上的人又特别多，她看不见林肯的面部，正当她不知该怎么办时，突然听到林肯对当地官员说：“我有一个小朋友，是她告诉我如何改进我的面容，如果她在这里的话，我很想见到她，她的名子叫格雷丝·比德尔。”听到这些，格雷丝太激动了，她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来到月台上的人群中的。

总统愉快地把她介绍给大家，并把她举向空中，还亲切地在她的脸上亲吻。格雷丝望着这身材高大、平易近人的总统愉快地笑了，因为在林肯满布皱纹的脸上已经留起了连鬓胡子。

邋遢总统

在美国历任总统中，第五任总统詹姆斯·门罗可谓是个不修边幅的邋遢总统。一次，一名刚到任的欧洲外交官首次访问白宫，无意中看到一个秃顶的人，穿着极普通的条纹薄织上衣，肮脏的背心上墨迹斑斑，脚穿拖鞋，在办公桌上写字。那外交官对美国总统竟会雇用这样的邋遢的职员感到十分吃惊。然而，更令他瞠目结舌的是，当白宫官员介绍他与门罗总统见面时，起身迎接他的竟然就是那位秃顶的邋遢先生。

美国几位总统的幽默

林肯总统有一次批评一位说话冗长的演说家时说：“他是我所遇见的人中，能把极多的话压缩进极少思想中的人。”林肯批评国会很尖刻，但不乏

幽默。他说：“人家说我正朝地狱走去，可是我没想到地狱只一里之遥，而且上面还有个圆顶（美国国会大厦是一座圆顶建筑物）。”一天晚上，一个惯于投机钻营的人打电话问林肯，说主管关税的人死了，是否能让他来接替。林肯回答道：“如果殡仪馆没有意见，我当然不反对。”

肯尼迪在 1952 年当选参议员，有人说他之所以获胜，是靠他父亲的雄厚财力。在一次宴会上，肯尼迪取出一封据说是他父亲打来的电报，大声念道：“亲爱的儿子，请不要多买一张选票，赢了便好；假如要我为大胜的多数选票付钱，那我就完了。”

罗斯福总统有一则“和稀泥”的幽默故事。一次，他的夫人到总统办公室参观，刚坐下，两位有矛盾的部门负责人先后前来向总统报告他们对同一个问题拟定的不同计划。总统听完前一个人的汇报后说：“海罗，你绝对正确，绝对正确。”他听了后一个人的汇报后也说：“霍布金斯，你绝对正确，绝对正确。”这时，罗斯福夫人对丈夫这种和稀泥的态度非常不满，说道：“你不该这么做。这两个人都是你重要的行政主管，你应当让他们明白你的正确态度。”罗斯福连忙说：“对，对，夫人，你是绝对正确，绝对正确。”

美国总统与电影

美国电影在第 28 任总统威尔逊在任期间，正是好莱坞的发展初期，每年都有大量的黑白影片问世。世界电影界的前辈、创设奥斯卡电影奖的著名制片人道格拉斯·范滕克特地赠送一套电影放映设备给威尔逊，让总统安坐在白宫内便可观赏最新出品的影片。第 30 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将白宫东部一个衣帽间改建成为试映房，并正式命名为“家庭电影院”，这一举动使得总统看电影的癖好公之于世。从小患有小儿麻痹症的小罗斯福总统，据说是性感女星格罗丽亚·斯雯森的忠实观众，大家认为观看艳星电影对于不便步行的小罗斯福总统具有心理补偿的功效。约翰·肯尼迪总统精力充沛、浑身是劲，他最爱看武打片、暴力片，像轰动一时的《万夫莫敌》、《六月六日》、《007 系列》以及由史蒂文·康纳利主演的紧张、刺激的侦探片他都喜欢看。约翰逊总统一看电影立刻鼾然入睡，映毕他又立刻精神抖擞，久而久之，白宫的高级助手们都尽量找借口不陪这位总统大人看电影，以免看完了电影还得加夜班。尼克松总统偏爱军事片，《巴顿将军》这部军事名片，还被他运用在越南战场上。“花生总统”卡特则好奇心特强，他曾特地指名观看反映美国记者揭露“水门事件”真相的影片《大阴谋》。而里根由演员登上国家元首的宝座，则更是世界电影界的一大盛事，里根及其夫人南希早年都是好莱坞的风云人物，所以在周末晚上他们总是观看自己以前主演的影片，以便重温一下往日情怀。

里根“患癌—康复”启示录

美国总统里根 1985 年以来，先后做结肠癌手术两次，鼻部皮肤癌手术一次。这位当今世界政坛的风云人物，并未因此而退出政治舞台。

里根手术后，经常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他处理各种国际国内事务，仍然一如既往，精力充沛，谈笑风生，丝毫没有重病缠身之态。

人们定会将里根“大难不死”的奇迹归功于美国的医学科学发达，医疗

条件优越。其实，里根能够幸运地加入“癌寿星”的行列，除了客观条件外，尚得益于下述几点：第一，他的性格开朗，谈吐幽默，意志刚毅，自信心强，对待癌魔能“面不改色”。第二，他处于高层次文化水平，思想活跃，容易接受现代医学科技知识及肿瘤专家的“良策”，持“癌定可治愈”的信念。第三，他身为总统，日理万机，淡忘了自己是癌症患者。第四，他不论是当演员还是当州长、总统，都坚持体育锻炼，因而增强了体魄。

正是由于有这些“秘诀”，里根能够“临癌不乱”，始终保持乐观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情绪，充分调动了体内“抗癌部队”一免疫的战斗力的战斗力，从而接二连三地挫败了癌魔的攻击，取得了抗癌的决定性胜利。

里根抗癌成功的奥秘给人们不少有益的启示：1，它证明癌症并非“绝症”，当今先进的医疗技术有可能置癌于死地；2，它说明良好的精神状态和必胜的自信心是癌的“克星”；3，它告诉人们患癌后适当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儿，往往更能将癌置于“脑后”，有利于身体康复，而坚持体育锻炼，则可大大增强人们战胜癌魔的威力。

罗斯福的爱情悲剧

罗斯福夫妇可谓白头偕老，但这只是个形式。他俩早在 20 年代初感情就开始疏远，搬进白宫后，第一夫人埃莉诺第一件事就是辞退所有白宫仆役，全部雇用黑人，原因在于黑人驯服听话，不会把“家丑”外扬。罗斯福夫妇通常交流信息的方式，竟是写便条而不是对话。第一夫人容忍了总统和他的私人秘书露西小姐之间事实上的情人关系，而把她自己和丈夫的关系，当作一种朋友，一种公事上的伙伴关系。

远在 1917 年，罗斯福任海军助理部长期间，埃莉诺曾私拆露西小姐给罗斯福的情书，逼令罗斯福不得不在表面上忍痛割断了这段恋情，但暗地里一直与露西保持着暧昧的关系。而在其中，他的女儿安娜（罗斯福对她的信任超过对妻子的信任）为父亲和情人幽会做安排。1945 年 4 月 12 日罗斯福去世时，他的头就是枕在这位情人的臂弯中的。

罗斯福无法容忍自己妻子私拆情书给他的情书，而埃莉诺也不愿同一个人不爱自己的丈夫生活在一起，由此开始了长达 25 年貌合神离的夫妻关系。她作为第一夫人后，便埋头在忙碌的社会活动中寻找慰藉，每天晚上留给罗斯福的便条大都是关于对不幸人们的帮助请求。大概是感到自己对妻子太过分，罗斯福尽量答应她便条中的要求。

当罗斯福去世后，埃莉诺发现丈夫留下的“关于丧事的遗嘱”是给长子詹姆士，而不是她时，该是多大的心灵打击。但作为一个经历不幸感情生活的第一夫人，她具有一般女人所不具有的坚强意志。她夫妇两人都能克制自己，不让不美满的家庭生活给国家带来不良影响，这是可敬的。

肯尼迪被刺纪实

1963 年 11 月 12 日的早晨，当“空军一号”飞机在达拉斯机场降落时，阳光驱走了天空中阴暗的乌云。

肯尼迪总统为此而感到高兴。这是他当总统后第一次来到此地。3 年前，他没有能够赢得达拉斯的选票；他多么希望能够和这里的人民见面，而且人

越多越好。

当摩托车队接近市中心的时候，街上的人是那么多，以致保卫人员 4 次下车维持秩序，为总统座车开路。

康纳利州长和夫人兴高采烈地迎接总统及其夫人的来临。但是，他们明白，作为右翼分子活动的温床和充满反肯尼迪情绪的达拉斯不会欢迎这位出身东部的、有自由思想的总统。其实，肯尼迪也明白这一点，在即将到达拉斯时，对夫人说：“我们今天要去的确实是一个棘手的地方。”

摩托车队缓慢地驶进霍斯托街经过一幢 7 层楼得克萨斯学校图书馆然后驶入埃尔姆街。肯尼迪总统微笑着向周围的人们挥手致意，州长夫人高兴得简直不能自制，她转向肯尼迪总统，热情地说：“总统先生，你不能说达拉斯人不欢迎你吧！”

肯尼迪总统笑了一下。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埃尔姆街出现了恐怖的情景。此时，肯尼迪总统夫人正在向她左旁的人群挥手致意，忽然听到呻吟声，马上回过头来，只见丈夫面露疑惑的神色双手捂住自己的头颈，并轻声地说：“上帝，我被击中了。”

接着的几秒钟间，又传来两声枪响。其中一枪击穿肯尼迪总统的头部。

当总统颓然倒在他夫人的膝下的时候，肯尼迪夫人大声叫道：“他们打死了我的丈夫！”并对受到致命伤的总统说：“我爱你！”

康纳利州长在第一声枪响时，曾经回头张望过总统。但随即他自己的背上也被子弹击中而受了重伤。他叫喊说：“喔！不，不，不！他们要把我们全杀了！”

受了伤的肯尼迪总统被送往距出事地 7 公里的帕克兰达医院。座车以每小时 150 公里的速度飞驰。那里有一个 12 名医生组成的抢救小组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

到了医院，医务急救人员把肯尼迪抬上了担架，然后将他送进外科一号病房。

抢救工作进行了 30 分钟，尽管医务人员想尽了一切办法，但还是没有将肯尼迪抢救过来。

下午 1 点，在举行了天主教祈祷仪式后，正式宣布 46 岁的美国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当天教徒将白色的床单罩在肯尼迪头上时，肯尼迪夫人将手上的结婚戒指脱下，轻轻地戴在肯尼迪的手上。

后来也曾入主白宫的美国总统卡特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当时我正在乔治亚州农场的花生田里开拖拉机，有人将肯尼迪遇刺身亡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哭着说：“自从我父亲去世之后，已经将近 10 年没有为他人哭过。”

在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当天，达拉斯市还发生了另一起谋杀案。

那天电台里宣布了肯尼迪死亡的消息。这时，一位曾经服役 11 年的老兵泰比特奉命在达拉斯市的克里夫地区第 10 街巡逻，他听到了广播里正在播送枪杀肯尼迪嫌疑犯的外表特征。15 分钟后，泰比特看见一名同广播里描述的嫌疑犯很像的人，便跟踪到了帕童大街。他发出命令让那个男人停下。可是当泰比特从巡逻车上跳下来时，那个男人突然转身，掏出手枪朝泰比特连开数枪。

后来在警察局的档案里查证，这名男子叫奥斯瓦尔德。在他开枪打死泰勒比之后，匆忙地躲到了德克萨斯州的剧院和电影院里。经过一番搏斗，奥

斯瓦尔德终于被 5 名警察抓获。

在奥斯瓦尔德被逮捕 25 分钟之后，弗里兹警长从德克萨斯一所学校图书馆回到了警察局。在那个图书馆里，弗里兹警长等人已经发现了一些刺杀肯尼迪总统的线索。

弗里兹警长命令黑尔搜查有关刺杀的证据，并将奥斯瓦尔德关押起来。当有人问这是为什么，弗里兹解释说：“奥斯瓦尔德被那所图书馆解雇了，他以后没有找到其他工作。”

在帕克兰达医院里，有关人员不顾一位地方警官的抗议，将肯尼迪的尸体放进棺材里，然后抬进救护车。这位警官对着总统生前的保安人员尖叫：“你们违犯了本地法和州法！你们不能把尸体从这里运走！”

肯尼迪的助手肯·奥多恩叫道：“滚开，杂种！不然车就从你的身上压过去。”

在前往达拉斯机场的路上，心情悲痛肯尼迪夫人拒绝换去那件溅有他丈夫鲜血的裙子。”这是他的血，我要保留凶手的罪证。”她说道。

到了机场，肯尼迪夫人和总统助手们先后登上了“空军 1 号”飞机。副总统约翰逊在机上庄严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

10 分钟后，“空军 1 号”滑入了跑道，飞往华盛顿。

接着，地方警察、联邦调查局官员和总统保安人员开始对奥斯瓦尔德审讯。经过近两天（12 小时）的审问，这位前海军陆战队员始终否认他想谋杀肯尼迪总统或泰比特。

奥斯瓦尔德最后仍被指控犯有谋杀罪。11 月 14 日早上奥斯瓦尔德被带出警察局。这时，全国数百万人在看着电视实况转播。突然，夜总会老板杰克·鲁比从电视节目主持人和侦探中间穿出，伸出右手，举起一只口径为 0.38 毫米的小手枪，对着奥斯瓦尔德腹部开了一枪。

数百万电视机前的美国人顿时惊得目瞪口呆。

当奥斯瓦尔德倒在达拉斯警察局刑场上时，肯尼迪夫人和她的两个孩子走出白宫，来到了国旗覆盖的安放肯尼迪遗体的棺木前，默默地向他致哀。

11 月 25 日，举行了肯尼迪葬礼。

这就是美国第 35 任总统肯尼迪遇刺的全部经过，它永远记录着美国历史上的一个悲剧！

